

(学会内部交流，非卖品)

胡适研究通讯

第4期



胡适研究会编

2008年11月25日

目录

《丁文江年谱》序	耿云志	1
《傅斯年社会政治活动与思想研究》序	耿云志	5
赵元任在美国的白话文运动	周质平	7
胡适和陶行知	方利山	10
胡适两次举荐张伯苓	梁吉生	14
胡锺吾与胡适的老乡情结	汪汉水 耿培炳	16
胡适与张爱玲的君子之交	姚承秀	21
日本胡适研究论著目录稿续编（1920~1969）	石立善	24
简讯		29
中研院近史所胡适纪念馆主任变更启事 敬告读者		

《丁文江年谱》序

耿云志

宋广波近著《丁文江年谱》，约五六十万字，读起来十分引人兴味。彼求写一序，我很乐为之。因为我本人对丁文江这个人物一直很感兴趣。

早在三十多年前，因搞民国史研究的需要，我曾编写过一些民国人物的小传，其中就有丁文江。那时，文革尚未结束（大约是1975年），因所见材料有限，我想去访问一些与丁文江有过直接交往的人，请他们帮忙提供一点材料，或哪怕仅仅是一些材料线索。但结果很令我失望。这不能怪那些被访问者，例如黄汲清、高振西，他们当时还处于被管制的状态下，他们怎敢对一个官方一向大为反感的所谓反面人物提供什么正面的材料呢。记得，当我写成丁文江小传的初稿，请当时担任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所长的张文佑先生拿去研究所征求意见时，给我的回话竟是尹赞勋先生的最有代表性的一句话：“怎么能给丁文江这样的人立传呢？”

时隔三十多年，人们对丁文江这个人的看法，已根本有所改变，对丁文江的研究，已有长足的进步。在此情况下，不带任何偏见地，实事求是地研究丁文江已成为可能。读了广波这本书，我们对丁文江应可有一种比较客观的，比较全面的看法。所以，我想先谈谈丁文江这个人。

—

丁文江首先是一个科学家，而且是一个作出伟大贡献的科学家。中国之有近代科学和科学事业首先是地质学开其端；而中国之有近代地质学和地质事业，是由丁文江、章鸿钊等两三个人开基建立起来的。丁文江手创地质调查所，并担任所长多年，亲自做云南、贵州、广西、湖南、江西、长江三角洲、河北、山西、陕西、河南、山东等省的地矿调查。为培养地质调查的人才，又手创地质研究所，为中国培养出一大批很有造诣的地质科学家。丁文江在从事地质调查和地质科学研究的过程中，又连带地做古生物学、人类学、人种学等学科的研究，成为这些领域的先驱者。丁文江又手创中国的《古生物志》并一直担任主编，这个杂志，成了第一个为国际一流科学家交口赞誉的中国人办的科学期刊。

著名物理学家李书华曾论到中国地质科学带动近代中国的科学事业的意义。他说：“近来中国各科科学论文发表后曾引起世界学者的重视，予以批评引用，而导其先声并为各科中之最发达者，当推地质学。假定没有地质学提倡在前，说不定中国的科学发达要迟若干年。所以地质学对于中国的学术进步的影响，意义尤为重大。”

丁文江还是一位不可多得的杰出的科学事业的组织家。

上面我们已经说到他在创建地质科学和组织地质调查方面所发挥的卓越的组织作用。实际上他还对历史语言研究所及其考古学的发展，对静生生物研究所、社会科学研究所的创建和工作的开展，对北京大学地质系、中央大学地质系的改进和发展，对中央博物院的创建等等，都曾给予过极大的关注与支持。他的科学组织家的才能，在他担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的短短一年半的时间里得到最充分的体现。他在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任上，做了许多工作，其中最有长久意义的有三件事：成立评议会；组织基金保管委员会；实行研究所预算管理。当时的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说，这几项工作“为本院立坚定不移的基础”。胡适也说，丁文江通过这几件事，“把这个全国最大的科学研究机构，重新建立在一个合理而持久的基础之上”。后来做过中央研究院院长的朱家骅具体说到成立评议会的意义。他说“评议会的成立，是在君（丁文江字在君）先生替中央研究院立下了百年大计。有了评议会，才有后来的院士会议，

有了院士会议，研究院的体制才正式成立。”

丁文江还是一位特别优秀的教师。丁文江从 24 岁游学归国，25 岁即开始做教师，以后在地质研究所，实际上也还是担当着教师的工作。其间，他曾在其他高等学校做过兼职教师，为学生讲遗传学之类的课。再后来，又做过数年的北大地质系的研究教授。可见，丁文江一生，有相当一部分时间是贡献给教育事业的。从现在保存下来的许多材料让我们知道，丁文江是一位非常优秀的教师，堪称是教师的模范。

李济说：“受过他教的学生，没有不心悦诚服的。”为什么呢？因为丁氏对学生极端地热忱和负责任，对教书总是拿出全力去从事。他的学生高振西回忆说：“他不教则已，他既教了，他是用尽了他所有的力量去教的。”教材决不肯用现成的，“他要搜集普通的，专门的，不论中外古今，凡有关系之材料，均参考周到，然后再斟酌取舍。”丁氏自己曾说：“讲一点钟，要预备三点钟，有时还不够！”可见他是如何地认真。他的教书，不同于普通的教书匠的教书。他不重在传播知识，而重在教人以获得知识的方法。例如他在北京高等师范兼课讲遗传学，开场白他就说，我不是教遗传学知识的，而是教如何获得遗传学知识的方法的。他告诉学生，应当向实验生物学，细胞遗传学和谱牒遗传学三种途径去求得遗传学的知识。自然，丁先生教得最多的还是地质学。他教地质学极端地重视实地训练。地质研究所的学生经常由教师带领学生到野外去实习。实习的地点和实习的时间，都要经过详细的考虑同周密的计划。丁文江还必须事先了解实习地的情况，然后才肯带学生去，是为了保证学生从实习中得到切实的训练。

丁先生待学生和后辈的真诚和热心，真是无与伦比的。胡适说：“他对于青年学生，有过必规劝，有成绩则赞不绝口。”比如，中央大学地质系聘得一位留美归来的地质学教授郑原怀。此人有发财的欲望，利用大量的时间精力去做房地产生意，以至教学与科研均无成绩。丁文江从当时任中央大学校长的罗家伦那里得知情况，便找到郑原怀，很直率地对他说，你在哈佛学经济地质成绩很好，这个专业，大学和国家均甚需要。你若再不认真从事专业，我就建议罗家伦校长解聘你。丁文江是中国地质学的开山人物，早已声名藉藉，郑氏不过一个地质界的年轻后辈，受丁氏如此真诚而直率的规劝，焉能不为之感动。从此专心向学，当年即发表两篇很有水平的科学论文。这是“规过”的实例。若谈到“奖善”的例子，则不能不提到丁文江最喜爱，最器重的学生赵亚曾。胡适曾记道，有一次，他从上海回到北平，见到丁文江，丁二话不说，先要给他介绍他自己最得意的学生赵亚曾，说赵是“地质学和古生物学新出的一个天才”。丁氏说话时那种高兴、快乐的神情十分令人感动。不久，这位天才的年轻的地质学家竟在云南考察时，被土匪打死了。丁文江为此悲伤哭泣了好几天，无心做事。后来，他发动朋友为赵氏募集纪念基金，以奖励后来者，捐集抚恤金，保障其家属的生活和子女的教育，丁文江还亲自负起教养赵亚曾一个儿子的责任。如此师生情谊，可谓千古佳话。

二

丁文江与中国的大多数学者、科学家不同的是，他极富行政才能。这种才能大概来源于他一贯地对于“公事”的热心。我这里说的“公事”，是泛指朋友的事、团体的事、社会上事、国家的事。早在日本留学时，和赴欧留学的过程中，他已充分表现出他办事的才干。归国后，以其热心公事而又特别能办事，很快在朋辈中得到“丁大哥”的美誉。丁氏的行政才能，在他创办地质调查所、地质研究所，帮助改进北京大学和中央大学的地质系，经理北票煤矿，以及担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的过程中，已被人们充分地认识到了。然而最能表现他的行政才能的，还是他担任上海总办的时候。不过，对于丁文江担任上海总办一事，颇有非议之者。当年的国民党和共产党都在反军阀，而丁文江的上海总办是由军阀孙传芳委任的。孙传芳是国民革命军讨伐的“反动军阀”之一，丁文江自然应视为“反动派”的一员，是“反

革命”。这在过去革命思维盛行的年代是不言而喻的。当时正在欧洲留学的傅斯年就认为丁文江是反革命，并表示，他回国后一定要杀丁文江。但回国后的傅斯年却很快地与丁文江成了好朋友。孙科当铁道部长时，须请一位地质专家为川广铁路做地质勘察，人们向他推荐丁文江。孙惊讶地说，怎么可以任用反革命！一当丁文江完成了勘察任务，孙氏再也不以反革命相视了。而且后来国民政府还曾一度想请丁文江接任铁道部长。大概共产党给丁文江戴反革命的帽子的时间要长得多，从1926年一直到1970年代末。

我觉得，评论一个人，首先要看他具体做过什么事，这些事发生什么样的影响。而不应先主观地把他归到某一个类，再根据这个类的一些特性来评论这个人。

那么，丁文江在担任上海总办任内到底做过些什么事呢？根据当时的大量报道和记载，他主要做了三件事：一是收回上海会审公廨；二是设立上海卫生局；三是绘制上海全图，部划道路交通，整理税收，建立考试用人制度等，以建立现代市政的基础。对于后两方面的事，以往人们不注意，没有引起什么争议。对于第一件事，争议颇大。革命党人（包括国民党和共产党）认为，收回会审公廨非常不彻底，给帝国主义仍保留了一些特权。这种批评不是没有根据的。但问题是，自从五卅运动后提出此一问题，屡次交涉，毫无结果。当时帝国主义在华势力仍很强大，全部收回上海地方的司法权力是暂时做不到的。在不可能完全收回司法权力之前，是什么事都不做，还是尽其可能地做一些事？我以为还是尽可能地做一些事好。事实上，丁文江当时很明确地将此次收回会审公廨的章程作为向全部彻底收回的一种过渡办法，是朝着正确的方向向前走了重要的一步。那种要么就完全彻底，要么就什么也别做的思维逻辑，我看不出有多么高明。

丁文江作为一个科学家而非常关心政治，议论政治（如最热心地参与创办《努力周报》和《独立评论》，且又是最热心的撰稿者），有时甚至直接投身于政治（如担任上海总办），这决不是表明他有特别的政治野心。他的热心干政，完全是基于一种牢固的信念：他认为，政治不改善，一切事业都难得进步发展。丁文江是个彻底的改革家，是个完全的淑世主义者，他是随时都要努力做事的人，所以他最恨懒惰，最反对悲观主义。他曾说，像他这类人，“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饭桶”。认真说起来，丁文江所处的正是乱世，或至多是个治乱交错之世。然而，就是在此种世势之中，丁文江仍是个大有作为的人。他创办地质调查所、地质研究所，使成为世界公认的第一流的科学研究机构；他办北票煤矿，使之成为持续赢利，稳定发展的新型煤矿；他担任上海总办不到一年，就办了几件大事，为上海的现代市政管理打下基础；他担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一年半，就为这个全国最重要的科学研究机构确立了长期发展的牢固基础。这种个人的经历，更加坚定了他的信念：只要努力，总可以有为。也正因为此，他特别强调“少数人的责任”。他曾有专文讨论这个问题，从历史、社会和政治上说明其道理。我现在想从心理分析上，说明他强调“少数人的责任”的道理。丁氏在那篇《少数人的责任》一文的最后一段说，当时的中国，受过初等教育的不过四百万人；受过中等教育的不过四十万人；受过高等教育的不过八万人。我觉得他对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数的估计可能偏高了，实际没有那么多。丁氏的意思是说，有机会受到高等教育的人是很少的。他所说的少数中的少数，优秀中的优秀，又是这少数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当中的少数。他们应略懂现代科学和中外大势，并在社会上占居一定的地位，有一定的影响力。显然，这样的少数人，这样的优秀分子，一定是拥有别人不能拥有的社会资源，得到别人无法得到的机会，获得别人不能获得的种种援助，才终于成为这样的少数中的少数，优秀中的优秀。既然如此，这少数中的少数，优秀中的优秀，若不肯出来奋斗，岂不是受了恩惠而不肯回报，得了便宜而不肯尽义务，岂不是忘恩负义的小人了吗？傅斯年在悼念丁文江的文章里便说，在丁文江看来，“只有龟勉服务，把自己所有的能力都尽了，然后可以问心无愧”。我大胆地推测，像丁文江这样的改革家和淑世主义者，都怀有类似的心理。这种心理，我们在丁氏的好朋友胡适那里也能看得出来，试读一读他的《不朽》和《我的信仰》，就会承认我的说法不错。

正是基于此种心理，产生出他的高尚的人格。

丁文江向自己的朋友说，他觉得自己在两方面是可以自信的：第一，是有责任心，这一点，通过上面的叙述，已经很清楚。第二，是公私清楚。这一点，是丁文江最令人佩服的地方。傅斯年说：“他从来不曾坐过免票车，从不曾用公家的费用作私用，从不曾领过一文干薪。”他不但不占公家的利益，在需要的时候，他还要牺牲私人的利益，以成全公家或他人的利益。有一件事很令人感动。1919年，丁文江的弟弟丁文渊到欧洲留学。有人知道，其学费全靠其二哥丁文江艰苦支撑，就劝文渊写信给他二哥，利用其二哥的社会关系为自己争得一份江苏的留学官费。文渊随即按朋友的意思写信给二哥，请他设法。然而丁文江的回信却说，照你的学历，你的勤学和天资以及我们家中的经济状况，你当然有资格去申请官费。……不过，你应当晓得，在国中比你还要聪明，还要用功，还要贫寒的子弟，实在不少。他们就是没有像你有一个哥哥，来替他们担任学费。他们要想留学深造，唯一的一条路就是争取官费。多一个官费空额，就可以多造就一个有为的青年。他们请求官费，确是一种需要，和你不同。你是否应当细细的考虑一番，是不是还想用你的人事关系，来占据这样一个官费空额？我劝你不必再为此事费心。我既然承认担负你的学费，如何节省筹款，都是我自己的事，你只应当安心的用功读书就行！这是何等高尚的胸怀！

1934年，丁文江接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那时，国力不强，经费有限。丁氏一上任，就宣布裁撤总干事署下的庶务处，节省出经费，以增加各研究所的研究经费。也是在这一年，听说云南教育厅请孟宪民等去云南做调查，丁文江连夜将自己从前在云南调查所得之相关资料整理出来，交给孟宪民等参考。可见，他对同事，对公益事业，是何等的无私。

因为无私，他对家人，对朋友，对一切他认为于社会国家有用之人，他都给予一切可能的关怀和帮助。在这些方面，他可以说是中西道德合璧的一种结晶品。

三

宋广波著的这本《丁文江年谱》，为我们提供了极其详备的材料，使我们可以对丁文江有全面而深入的了解。他的材料来源十分广泛，包括政府公报、公私档案、报纸期刊、丁氏及其家人、朋友们的书信、相关人士的著述、日记、回忆录、访谈录等等。可见作者在搜集材料方面是下了大工夫，在迄今所见的有关丁文江的著述，没有堪与比拟的。今后相当一段时期里，想对丁文江有所了解，有所研究的人，都不能不参考这本书。

作者在充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完全用事实还原历史，还原人物的本来面貌，不带主观的成见，不加主观的议论。对谱主历来有争议的方面，不同的记载，不同的评说，皆予并存。例如，丁文江任上海总办时期的活动，谱中收入当时各种舆论评说的同时，也将国民党和共产党的评论一并收入。

这本年谱的编辑体例堪称完备。全书包括“谱前”、“本谱”和“谱后”三个部分。在“谱前”部分，颇详细地交代了丁文江出世前，西方近代科学，特别是与地质学相关的科学在中国被引入和初步传播的情形。如此，人们便可以更清楚地认识到，丁文江等开创中国地质科学事业的历史意义。“谱后”，一般年谱没有这一部分。但对于丁文江这样影响很大而争议甚多的人物，就显得很必要。我们读了本书的“谱后”部分，确能进一步了解丁文江的历史贡献和他应当占有的历史地位。在“本谱”，亦即正文的部分，于每一年，扼要交代当年发生的大事，并介绍与谱主个人及其事业相关的人士之生卒。凡谱主的重要活动，连带记出当时或稍后有关人士的评论与追忆。年谱都是“以年系事”，年代是中心线索。但这本年谱在记叙中颇注意到一件重要史实的首尾关联，即是作者在《编撰说明》中所说的“大事编年与记事本末两体并用”。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本书书后附录了若干种《索引》，例如《人名索引》、《书名索引》、《引用书名索引》、《引用书著者索引》、《引用报刊索引》、《引用档案索引》等

等，极大地便利于读者的检索。

本书由于作者采取严格科学的态度，充分揭示历史事实，彻底打破了教条主义贴标签式的人物论评与研究的方法，时时处处让人关注具体的历史情境和具体的历史事实，通过深入具体的历史情境，了解具体的历史事实，产生对历史人物的看法。这中间颇有一些矛盾的现象和矛盾的叙述，但诚如马克思所说，历史是从矛盾的叙述中清理出来的。例如，对于丁文江担任上海总办，当时的大多数舆论与南方的国民党及共产党的评论是迥然不同的。但由于事实充分，所以不影响人们对之作出自己的判断。同样地，同一个人，由于历史情境变化，对丁文江有截然不同的说法。比如同是中国地质学开创期的，亦被丁文江引为重要朋友的科学家李四光，他在解放前与解放后对丁文江有截然不同的评价，这丝毫不影响人们透过事实，看出历史的真相。

我认真仔细地读了全书，觉得这是一本值得广大读者认真一读的好书。无论什么人，你是做行政的，是教书的，是做研究的，还是正在读书的年轻人，你只要是那个有志向上的人，想有所作为的人，你就一定可以从这本书中得到一些很有益的东西。

耿云志 2008年7月12日于北京太阳宫寓所

《傅斯年社会政治活动与思想研究》序

耿云志

傅斯年先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位健将，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学者和卓有成就的历史学家、教育家。同时，他又是一位少有的学术组织家，他对中国现代学术体制的创立与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傅斯年是一个极具人格魅力的人物，可敬复可爱。其可敬，因为他一身正气，不惧当道，敢于抨击巨室显宦；他能正己正人，毫无假借。他又能为学术争自由，为教育争独立。殷海光说他“是有至大至刚之气的读书人，为争得一点学术自由、教育独立，操尽了心，费尽了力”。其可爱，因为他非常诚恳、率真，他的同辈朋友说他是一个“元气淋漓”的人。因为他满身正气，又诚恳、率真，所以能产生极大的人格力量。他的老师和朋友胡适说：“他无论在什么地方，总是一个力量。……他这样的人，无论在什么地方都能发挥其领袖的才干。他有学问，有办事能力，有人格，有思想，有胆量，敢说话，敢说老实话，这许多才性使他到处成为有力量的人。”“一个到处成为道义力量的人”。

对于这样一位可敬可爱的前辈，因为种种原因，过去我们对他注意不够，研究更少。近十几年来，对傅斯年的研究，才刚刚兴起，已经陆续有几种专书问世，发表了一些有分量，有深度的研究论文，开过几次研讨会。如今，马亮宽先生的这篇博士论文即将出版，给这个刚刚兴起的傅斯年研究，又将增加一分推动力。

亮宽先生此书，在搜集材料方面下了很大的工夫。他曾两次到台北搜集有关傅斯年的材料，所以，我们能够从他的这本书里，看到别的书里所看不到的一些重要材料。例如，傅斯年给蒋介石的信，有关于用人行政的建议者，有关于大吏孔祥熙贪渎事者。又如，书中首次揭示侯延爽与傅斯年之关系的材料。作者说，侯延爽在清末“投身革命”，此说不够准确。按，侯延爽乃清末立宪运动的重要人物，与梁启超关系密切，梁氏创办立宪团体政闻社，侯延爽任庶务员。在清末，社会团体之庶务一职，是团体中十分重要的角色。后来因梁启超等有在武汉创办《江汉日报》和法政学堂的计划，又派侯延爽回国专在两湖一带活动。我想，

傅斯年本是个激情四射的人物，然而，他却一生坚持和平改革的立场，这或许与侯延爽的影响不无关系。

亮宽先生在书中很强调，傅斯年最后之追随国民党政府到台湾，是他对蒋介石个人的忠诚。他的看法不能说没有根据。但我以为，更重要的恐怕还是自由知识分子的一种政治选择。他们相信，深受美国影响的国民党政权，可能终究会走上西方式的民主政治之路。我接触过的许多台湾学者，大体也都有过类似的心路历程。

傅斯年是一位极具思想能力的人，他在主办《新潮》时期，已充分显露出这一点。“五四”刚过去三个多月，他就能对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作出极深刻的反省，就担心运动高潮一过，“结个不熟的果子，便落了。”他特别盼望的，“还是思想界厚蓄实力，不轻发泄。”他尤其关注改造社会的工夫。关于这方面，我在四年前有专文论述（参见耿云志：《傅斯年对五四运动的反思》，《历史研究》2004年第5期）。胡适曾多次提到，傅斯年等这批青年学生，在五四时期，思想之成熟与深刻，超过了他们的老师们。

亮宽此书是研究傅斯年的社会政治活动及其思想的。这里的思想当然是指他的社会政治思想。傅氏和他同时代的绝大多数读书人一样，都满怀忧国忧时，因而时常禁不住要议论时政，批评时政。对傅氏而言，从五四时代即已如此；留学归国后仍然是如此。《独立评论》时期，他是对日态度比较激烈的人，他对他所尊敬的胡适先生一度低调的态度很不满，甚至声言要退出《独立评论》。但这时期，他们都只是议政而不参政，更不从政。到了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们中的许多人有了改变，曾经绝对不愿从政的胡适去当了驻美大使。傅斯年也去当了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参政员固然仍是议政的角色，但参政会是战时国家体制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参政员的议政，应属体制内的议政，这与体制外的自由议政应是有区别的。令我们感佩的是，傅先生在参政会内，似乎并不存体制内的忌讳，其炮轰孔祥熙的激烈程度就是明证。孔氏当时身任行政院副院长，不仅掌管经济财政，有时亦涉及外交，可谓党国要员，甚至可说是蒋介石的左膀右臂。傅氏为国家计，不避忌讳，激发谏论，大有国土之风。

研究傅斯年的社会政治思想，除了要说明他在各时期对国家内外大政方针的主张之外，必须要揭示他对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深层思考，或者说应该揭示出他的基本的社会理想。对此，本书作者在全书的最后部分，《傅斯年的自由社会主义思想论析》中说：“他（傅斯年）在长期的探索中，将自由主义思潮的自由、民主和社会主义思潮的经济平等结合在一起，将自由社会主义的理念作为自己追求的目标，并为此奋斗了一生。”这一论断是符合傅斯年的思想实际的。傅氏自己说：“我平生的理想国，是社会主义与自由并发达的国土。有社会主义而无自由，我住不下去；有自由而无社会主义，我也不要住。所以，我极其希望英、美能作成一個榜样，即自由与社会主义之结合。”傅斯年自己承认，这是他的理想国，是不容易实现的理想国。和傅斯年有同样理想的人远非少数，不但中国有，在世界上也大有人在，它是一种带有普遍性的思潮。这一思潮，有它不切实际的空想性的一面。但任何思想都是存在的反映。区别只是反映的是否全面、深刻，符合事物的本质。自从马克思主义揭示了资本主义的本质之后，资本主义社会两极化和因此演成的社会矛盾，就再也无人能够掩饰。如何缓解矛盾，维系资本主义的生存，成为资本主义世界有识之士冥思苦索的严峻课题。他们尝试着容纳某些社会主义的原则和政策，缓解了社会矛盾，延续了资本主义的寿命，使“垂死的资本主义”延续到今天，并且显示出仍有其继续生存和发展的余地。这一世界性的事实，就是产生“自由社会主义”或“民主社会主义”的前提。

我们应当知道，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论，是建立在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基础上的。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基础上，取而代之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毫无疑问地已经包容了资本主义所创造的一切文明的合理的和优秀的东西。所以，它之能够战胜“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是不言自明的。但事实上社会主义革命都是发生在资本主义欠发达的国家，因此普遍存在着贫穷、落后的巨大困难。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主义如何战胜资本主

义，是把自己封闭起来，与世界隔绝，以免受资本主义的影响，还是向世界开放，并学习和借鉴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先进的东西，使自己强大起来？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然而，在改革开放以前，在提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之前，没有人敢于提出这样的问题。其实，这不过是一个常识的问题。比如两个拳击手在决斗，其中一方若能尽取对方的一切优点而有之，则他必能战胜对方。所谓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敢于向世界开放的社会主义，就是敢于向资本主义学习、借鉴的社会主义。尽取资本主义一切优势而为己有，最终战胜资本主义，这才是我们应有的志向和目标。傅斯年的理想国，是希望美、英等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尽量容纳社会主义的原则与政策，从而战胜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则和他相反，希望尽取资本主义一切优势而为己有，从而战胜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赢得社会主义世界性的胜利。

读亮宽先生的书稿，发生联想，随笔所至，连带及此。不当之处，请作者与读者批评。

耿云志

2008年5月28日于太阳宫寓所

赵元任在美国的白话文运动

周质平

（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教授）

早期欧美的汉语教学一向是为汉学研究服务的。说的更具体些，学习汉语的目的是为了研读中国古籍，所以有些学校的初级中文教的竟是古代汉语，芝加哥大学一直到上世纪60年代，还维持着这个现在看来有些荒唐的传统。现任芝加哥大学历史系教授艾恺（Guy Allito）在一篇悼念他中文老师许文锦女士的文章中特别提到了当时芝大的中文教学情况：

当时芝大的中文课程着重文言文，并没有现代汉语课程。选用的教材均为古代经典。

头一年我们的课本是《孝经》和《论语》，二年级则是《孟子》与《史记》。¹

艾恺是1965年班的学生，也是英文梁漱溟传的作者²。从这段简短的回忆中，可以看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大学的对外汉语教学，其主要的目的是在培养学生古代汉语的阅读能力，而非现代汉语的口语能力。而汉语课的教法，主要是通过翻译的练习。结果是训练出了一批自称能阅读古籍，而不能日常会话的“哑巴”汉学家（艾恺是少数的例外之一，他能说字正腔圆的普通话）。在这个传统下训练出来口不能言的中国专家，直到今天，在美国各大学的东亚研究系里还比比皆是。他们对汉语教学往往都有一个很深的成见：口语能力是“引车卖

¹ 艾恺，〈怀念许文锦女士〉，《传记文学》553（2008年6月），页127。

² Alitto, Guy. *The Last Confucian: Liang Shu-ming and the Chinese Dilemma of Modernity*. (California, 1979).

浆者流”的勾当，非学者所当问。在他们看来，现代汉语和所谓学问是完全无关的。

从这个角度来看美国的对外汉语教学史，汉语教学在美国也经历过一次“白话文运动”，这个运动的奠基者是赵元任。1948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的赵氏《国语入门》*Mandarin Primer*³第一次将口语的（以有别于书面的）现代汉语的语法结构，通过结构主义语言学的体系，有系统的介绍给了西方人。在这里，“口语的”三个字是很重要的，在此之前并非没有口语的汉语教材，但那些教材大多是为在华的传教士或商人应付日常生活需要而编写的。既没有系统的语法介绍，也没有严格口语的界定。赵元任的《国语入门》开启了对外现代汉语教学由书面走向口语的新方向。使许多研究中国问题的外国学者由“无声”转向“有声”，使中文由“死文字”变成了“活语言”。

为了进一步深化口语的现代汉语教学，赵元任在1968年，又出版了三册《中国话的读物》*Readings in Sayable Chinese*⁴，并杜撰了一个英文字sayable，亦即“可说的”。由此可见，他是非常有意识的，要把对外汉语教学由书面转向口语。这一转向是对外汉语教学现代化的第一步，也是汉语教学脱离汉学研究的“独立宣言”。在《中国话的读物》序上，赵元任说明了编写这套书的目的：

编写《中国话的读物》的目的是为高年级的学生提供可以实际应用口语中的书面材料。。书面的白话是不能说的，也不是为了实际口语而写的。。我经常发现，尤其是在我最好的学生之中，前一句是很好的中文，接着却是一句直接从胡适或者鲁迅文章中摘录下来的句子，作者（胡适/鲁迅）本人绝不会把这些句子用在他自己的口语上，而且这些文章原本就不是为了口语而写的。

The purpose of the present series of *Readings in Sayable Chinese* is to supply the advanced student of spoken Chinese with reading matter which he can actually use in his speech. ...But written *bairhuah* is not, nor is it intended to be, sayable in actual speech...I sometimes find, especially among my best students, those who speak perfect Chinese in one sentence and in the next a sentence straight out of Hu Shih or Lu Hsun which the

³ Yuen Ren Chao, *Mandarin Primer*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48).

⁴ Yuen Ren Chao, *Readings in Sayable Chinese*, 3 vols, (San Francisco: Asian Language Publications, Inc. 1968).

writers would never say in their own speech, nor intended to be sayable.⁵

赵元任一再指出“白话文”并不等于“口语”，是因为许多学习汉语的外国学生误以为“白话”就是“口语，”于是生吞活剥地把胡适和鲁迅文章的句子摘录到自己日常的会话中。其怪异的程度是可以想见的。

1952年，胡适在台北中国文艺协会讲<提倡白话文的起因>，提到赵元任常说：“适之啊！你的白话文不够白，你要不相信，我可以给你录音，你自己再听一遍。”胡适说：“他录了之后，再放给我听，觉得真是不够白。”⁶一般中国人认为白话文典范的胡适文章，在赵元任的眼里，往往只是“不可说的”（not sayable）书面语。

赵元任写的白话文是真正“我手写我口”的语体。他所编写的汉语教科书，无论是《国语入门》，还是《中国话的读物》，都尽量做到书面只是口语的记录，所以学生从书本里学来的每一句话，都能转化成口语。赵元任在海外汉语教学界进行的白话文运动远比胡适的更“白话”，更接近“语体”。

赵元任特别为《中国话的读物》写了<早年回忆>，来示范他所说的“能说的”白话文究竟是怎么样的。我引其中一段作为例子：

大概是我五岁住在祁州的时候儿，我们下半天常常儿有点心吃，他们给我留了一碗汤面在一张条儿上。没人看着。赶我一走到那儿，一个猫在那儿不滴儿不滴而的吃起来了。我就说，“猫雌我的灭！”⁷

在这段话里，不但保留了北京话的“儿化”，和状声词“不滴儿，不滴儿”连一个小孩把“吃”说成了“雌”，把“面”说成了“灭”，都如实地记录了下来。（赵元任用国语罗马字拼写的课文，连轻读都一一标出）。拿这段话和鲁迅名篇<风筝>中的“但心又不竟堕下去而至于断绝，他只是很重很重的堕着，堕着。”⁸一比，就能了然，什么样的白话文是能说的，什么是不能说的。

胡适在1917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之后，许多旧派学者，都将他的新诗和白话文视为洪水猛兽，没想到赵元任又把胡适的文章成了他的改革对象。

⁵ Yuen Ren Chao, *Readings in Sayable Chinese* Vol. 1, p. iv.

⁶ 胡适，<提倡白话文的起因>，《胡适演讲集》，中册（台北：胡适纪念馆，1970），页442。

⁷ Yuen Ren Chao, *Sayable Chinese*, Vol. 1, Part 2, p. 2.

⁸ 鲁迅，<风筝>，《鲁迅全集》（北京：人民，1981，共16册），册2，页183。

胡适和陶行知

方利山

(黄山学院徽州文化资料中心 , 中国黄山 , 245021)

[摘要]胡适和陶行知是中国现代文化教育史上的两位有重要地位和影响的代表人物,也是徽州文化中的两位历史名人,他们都为中国的文化教育作出了大的贡献,都为徽州文化创造了新的辉煌。不能因为两人的人生道路不同和歧见而强作主观褒贬。

[关键词]胡适 陶行知 实事求是 褒贬

在一些评介陶行知的文章中,为了突出陶行知“党外布尔什维克”的形象,强调其革命进步性,常常把胡适拖出来作对比,以胡适的“反动”反衬陶行知的进步,给人以两人“水火不相容”的印象。其实,这种主观褒贬,偏离了历史真实,是对人们的一种误导。我们需要回归历史,实事求是地分析胡、陶两人的某些歧见,对胡适、陶行知的贡献作出客观的评价。

胡、陶之同

胡适和陶行知这两位中国现代文化教育界的大名人,一个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一个是创造“生活教育”理论和为平民教育作出巨大贡献的人民教育家。他们同处在中国大动荡大变革的年代,同年(1891年出生)、同乡(都是徽州人,一个在徽州绩溪上庄,一个在徽州歙县黄潭源)、同学(胡适于1910年考取庚款留美生赴美学习,1915年9月转入哥伦比亚大学;陶行知1915年9月也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两个人同时师从美国教育家杜威,成为同学)。不仅如此,这两个年青人在当时都有一颗立志报效国家的火热之心。胡适出洋,想学习西方文明,“做一个科学的农学家,以农报国”;陶行知则立下心愿:“我是一个中国人,要为国家作出一些贡献来”。在大力宣传和推介杜威教育思想方面,胡适和陶行知都是非常积极的。1919年,陶行知、蔡元培、胡适等人,以江苏教育会、北京大学、南京高等师范等五个文教团体的名义邀请杜威来华讲学。1919年4月底,胡适和陶行知一同赴上海迎接杜威夫妇,此后两人陪杜威往南京、上海等地,历十四个省市,两年中他们分别为杜威200多场演讲担任英文口译。陶行知在这一期间,在《时报·世界教育新思潮》上发表了《介绍杜威先生的教育学说》,还为此后出版的《杜威先生在华讲演集》作了序言。而胡适则先在上海演讲中介绍“杜威博士的实验主义”,后又连夜写成《杜威与中国》,为杜威结束在华讲学作送行。胡适在文中极力推崇杜威实验主义哲学,认为这是自中国与西洋文化接触以来,外国学者在中国思想界影响最大者。认为杜威是人格之楷模(1)。当然,这两位杜威的得意门生,胡适在此后是着重对杜威的实验主义哲学作了阐发和宣扬,并结合中国背景作了发挥;而陶行知则是着重将杜威的乡村教育理论结合中国实际进行了创造性的改造和实践。

陶行知和胡适这两位同乡同学,在当时许多观点是一致和相似的。胡适主张开放女禁,大学招女生,陶行知则在南方办校就直接付之于实践,首开学校招女生之先例。胡、陶两人都主张作新诗,都大力提倡白话文。1919年,陶行知在南京高等师范,发函邀请胡适南下讲课,讲白话文文法,邀请汪原放介绍新式标点。1920年5月14日,陶行知写信给胡适,

要胡适一定在暑假到南京为暑期学校讲讲《中国古代哲学史》、《白活文法》，他说“我并且要为你找一个适意的地方居住，包您可以读书休息，包你可以免除一切无谓的应酬”。同年5月28日，陶行知又再次致信胡适，希望胡适来后多留几天（2）。

1922年4月25日，陶行知、胡适一起，和当时教育界名人李大钊、蔡元培以及王宠惠等十六人联名发表了胡适起草的《我们的政治主张》宣言，要求有一个“好政府”，表达对中国时局的关切。

在《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36册，收有陶行知给胡适的30封书信手迹，在信里，陶行知对胡适谈杜威来华的安排，谈邀胡适到南方讲课的安排，谈皖省教育、徽州歙县等地的教育和教师的情况，谈“庚款”问题，谈胡适的身体和休养，谈徽商工厂的经营问题，信中还谈到“胡太太”送的玩具，小孩“如得奇宝”那样的高兴。这些信，比较真切的反映了胡、陶二人的同学情谊。

而最能体现胡、陶二人“情意相融”的是关于陶行知更名的趣话。陶行知原名陶文俊。在研习了王阳明“知行合一”学说之后，陶行知认为“王学”很有意义，为表对“王学”的推崇，1911年他更名为“陶知行”。后来留学回国，结合杜威教育哲学，陶行知提出了“生活教育”、“教学做合一”，开始发现王阳明的“知行观”不符合唯物主义的认识论。1927年6月3日，他在晓庄作《行是知之始》的演讲时，明确指出：“阳明先生说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我认为不对”。提出“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把王阳明“知行观”翻了一个筋斗。当时有人就质疑陶行知名字叫“陶知行”，“名不符实”，正在陶为此也有些思索的时候，胡适1927年5月游美回国，在上海和徐志摩办新月书店、《新月》月刊，从事写作和讲学。“两人交往默契”。1928年3月，胡适受聘任上海中国公学校长，次年发表了《知难，行亦不易——孙中山先生的“知难行易”说评述》，其观点和陶行知一致，言论互为支持。由于胡适发表《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批评国民党为“反动派”，于是遭到了国民党文人的笔墨围剿，在胡适心情不快的时候，他的绩溪老乡上海汪裕泰老板汪惕予（杭州西湖汪庄别业的主人）设宴为胡适开怀。请了蔡元培、蒋梦麟（当时国民党教育部长）、陶行知、徐志摩、梁实秋、叶公超等陪同，请其侄胡乐丰款待。据胡乐丰事后回忆，当时在宴会上，大家先恭维胡适从“整理国故”到“研究和尚”，其成绩和贡献，以任何乾嘉大师、民国巨儒来平列互比的活，都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说胡适的《菏泽大师神会传》在中国佛教研究史上有开创性功勋。接着，大家重点议论起“行与知”的议题，都认为“行是知之始”，“实践出真知”，“实践是检验真知的唯一标准”。蒋梦麟则规劝胡适北上教书算了，不必在上海打笔墨官司，省得多淘气恼。胡适酒过三巡，激情地建议陶行知说：你我同庚，又是同乡，同校同学，更受业于杜威，又是同师。你的思想观念也早已叛逆了阳明之说，你“知行”这个名字是否可以掉过头来，称呼“行知”了呢？我提倡写白活文，也有人公开骂我名“适之”，“名不符实”。讲我“不懂之、乎、者、也、矣、焉、哉”，只知教授“你、我、他、得、的、地”，是误人子弟。我干脆把“之”字去掉，叫胡适。你不是也有人讲你“名不符其实，挂羊头卖狗肉”吗？固然名字只是一个人的符号，它与一个人的思想观念没有什么关系，但是省得人喜欢吹毛求疵，开你的玩笑。在席间大家听了胡适这些话，都拍手叫好，认为这是陶先生对胡先生的支持，而且也是表白自己名符其实的最好行为。陶行知听了，也高兴地仰天大笑。毅然点头表示了认可。宴会不久，陶行知在7月把《行是知之始》演讲稿整理成文，刊于《乡教丛讯》第三卷第十二期，并广告友人，将“陶知行”从此更名为“陶行知”，用行动表达了他和胡适在认知上的配合默契。

1930年胡适离开上海北上前夕，陶行知特地在上海租界上一家徽菜馆内定了胡适最爱吃的徽州家乡菜“一品锅”，悄悄盛情地为胡适饯行，徐志摩夫妇作陪，席间临别赠言：“这样的世界，知己朋友应该以同怀视之！”大家共勉：“一定要为继往开来，震古铄今的经典文化教育不付诸阙如而努力”（3）。

胡适和陶行知两人还有一个重要的共同点就是对家乡徽州浓浓的故乡情和故园爱。陶行知在1927年写有“给徽州同乡的公开信”，里面热情地讴歌“我们徽州，山水灵秀，气候温和，人民向来安居乐业，真可谓之世外桃源”，是东方瑞士，要求徽州人起来为全徽州作一个通盘的筹划，建设和保护徽州万年不拔之基，“不辜负新安大好山水”，造成一个让世人羡慕的新徽州。陶行知对徽州家乡的风情民俗、人文历史有着深刻的理解和强烈的感情。1923年春陶行知游南京牛首山，写了一首诗送绩溪的同伴，他在后记中写道：“吾乡称绩溪人为绩溪牛，人以为侮辱，我以为尊敬。因为牛是农家之友，没有牛，我们哪里来的饭吃呀？”

(4) 这年9月，陶行知又将从八达岭下购得的一块长城砖作为特殊礼物赠送给徽州家乡的隆阜省立第四女中，对徽州家乡的平民教育充满厚望：“我们徽州的土产本来不错，你看朱晦庵、江慎修、戴东原诸位先贤，那一位不是土产？”“譬如茶叶是家乡的土产，我们徽州人是没有不喜欢喝徽州茶的”。至于胡适对故乡徽州的挚爱，则早已给世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童年胡适在徽州绩溪上庄家乡所受的教育，让他铭记一生。无论是出洋、当大使，还是往各地讲学，胡适都常把“我们徽州……”挂在嘴边，放在心上，“徽州糶”、“一品锅”是他经常卖力推荐的“徽州土产”。胡适用了近二十年的学术时间为戴东原“《水经注》学术冤案”平反，固然最主要的是要给国人一个考据学方法的锻炼，反对以主观臆见杀人，强调完善法理，但其中亦有“乡谊”成分在内。胡适给绩溪老乡先后题词“我们是徽骆驼”、“努力做徽骆驼”，对于徽商在“大徽州”所作的历史贡献非常仰佩，他还从中国历史演进的角度肯定了“商”的历史进步作用。特别是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发生的婺源的十年“回皖运动”，胡适积极介入，这是一种浓浓乡情的流露。事后胡适回忆：“徽州的婺源，是朱夫子的出生地”、“婺源一县三面突出，战前为了‘剿共’方便起见，把三面突出的部分划给了江西省，可是全徽州的人都不愿意，一直闹到复员之后国大代表开会时，徽州同乡会作好呈文要向蒋先生请愿，我说‘给我吧’，我交给国大主席团代表张厉生，那时，张厉生是内政部长，他就照办了”。胡适说，把从来就属于徽州的婺源强行划入江西，“这是帝国主义的做法”，“徽州人岂肯把朱夫子的出生地划归江西？他们还把二程先生的祖先还算是徽州人呢”。(5)

1958年以后，晚年的胡适在宝岛台湾，乡愁日浓，一首“我从山中来，带来兰花草……”的校园歌曲流行两岸，人们从中可以窥见绩溪上庄胡适故居里那些徽州木雕兰花草，已经在游子胡适脑海中深深扎根。晚年的胡适，身处台湾南港，常常谈起徽州山地的自然环境，回忆徽州家乡的民俗风情，讲徽州方言“大概和浙江同一个语言系统，浙江的水源是从徽州来的关系”。胡适和人谈“徽州朝奉，自家保重”，谈朱夫子、二程、戴东原，谈徽州盐商，谈徽州程、汪二姓的繁衍发达，分布四方，谈徽州人的勤劳俭朴。他还多次表示，在写自传的时候，将要用一大章写徽州的背景。胡适在家里专门用徽州家乡的“徽州塌糶”招待徽州同乡苏雪林的时候，还特别从“徽州塌糶”谈到了当年徽商“十三四岁，往外一丢”的艰苦创业历程。

胡适和陶行知都受过中西文化的熏陶，他们表现出的对徽州家乡的挚爱，其实都是出于他们对徽州这片神奇土地所产生的举世瞩目的“徽州文化”的深刻理解。他们都早已看到，徽州文化作为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特色地域文化，不仅蕴积丰厚，而且和中华国学关系非小。他们对徽州故乡的挚爱，绝不是一般的“乡曲之心”。

平心论异

无庸讳言，胡适和陶行知，虽为同庚、同乡、同学，但各自的家庭生活环境不同，师从杜威后，对杜威哲学和教育思想的关注点不同，特别是留学回国后，各人的人生经历、事业发展的空间和环境不同，因而两个人虽在一些国家重大历史事件中有会合、有融洽，但也产生过一些隔膜和歧见。平静地客观地了解和分析胡适和陶行知交往中的相遇、歧见和碰撞，对还原历史真实的胡适和陶行知，不无益处。

1926年，胡适是赴欧参与英国“庚子赔款”处置的中国委员会三个委员之一，国内不少人反对当时所拟定的英国“庚子赔款”处置办法。这年3月27日，陶行知和凌冰等致信胡适，也表示了反对的态度。胡适于4月23日复信，将有关情况向陶行知作了解释。胡适在信中说：“有许多问题，此时不曾到可以正式发表的地步，我用私人名义写信说出，比较自由些”。胡适表示，他也是主张“退还”的，不必担心中国委员会会损害国家利益。胡适说：“我们三个中国的委员虽无他长，至少有一点可以与国人共见，就是都肯细心考虑，为国家谋永久利益，都有几根硬骨头，敢于秉着公心对国人、对外说话”。“深盼得你们和北京各位朋友的指教与帮助”。(6)

据黄艾仁教授对胡适与陶行知交往情况的考证和分析，胡适和陶行知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一直能配合默契，有深厚交谊，这是因为他们留洋学成归国以后，都有一番“教育救国”的雄心壮志，都想为苦难的祖国找出一条复兴之路。因此，他俩同心协力，竭力为杜威教育思想在中国的传播鸣锣开道，一起倡导“工读互助团”，一起草拟合译《中华教育改进社简章》，一起筹办“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一起进行“平民学校实地试验”。在1922年4月至5月的《胡适日记》中，就有两人亲密交往的不少记载。胡适起草《我们的政治主张》宣言，想邀几个“好人”加入，陶行知首先赞成，并担保王伯秋亦可加入，当时他们的政治观点一致，是“很知己的朋友”(7)。黄艾仁认为，过去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一般研究者对此往往是略而不谈，采取回避的态度，无疑这是不切实际的。陶行知对胡适有生活上的真情关心，1923年劝胡适到庐山疗养，有两人互相支持开展平民教育活动的许多实例。陶行知还对胡适作为中国八名代表之一出席美国“万国教育会议”非常赞同和器重，指出“兄在中国代表中所占地位，很关重要”。陶行知也明确肯定了胡适“整理国故”的观点，认为“胡适整理国故，最有见地，他所著的《中国哲学史大纲》虽然只成三分之一，已是不朽之杰作”(8)。黄艾仁也分析，陶行知与胡适在教育问题上，着眼点不同，胡适专注要在中国创办一流大学，着眼于“提高”；陶行知则主张从当时中国社会现实出发，推行乡村普及教育，着眼于“普及”，虽有一些想法上的分歧，但都在思考中国教育的推进。他们终极关注的目标，都是为国富民强振兴中华，不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

在全民抗日战争时期，陶行知受命到欧美各国宣传中国抗日，游历26国，进行国民外交活动。而在这个时候，作为中国驻美大使，胡适充分利用他在美国上下各界的影响和关系，积极宣传抗战，争取各方面人士对中国抗战的同情和支持，他到处演讲，直到累坏身体。他是在努力实践着自己“当了过河卒子，只好拼命向前”的誓言的。1937年胡适和陶行知在美国相见，陶行知10月给胡适的信中说：“这次在华盛顿相见，很为高兴，只因时间不足，不能畅谈，最是遗憾”(9)。可见胡适和陶行知都在同心努力为国出力。有人说胡适在美国当大使，抵制陶行知进行国民外交，不赞成陶行知的抗日宣传。不知这些说法有什么事实依据。

我们可以追溯的事实是，1938年陶行知在为《世界教育年鉴》(哥伦比亚大学编)撰写《中国篇》的时候，还不止一次地肯定了胡适的贡献，陶行知写道：“现时影响中国教育的所有各种力量之中，中国的文艺复兴所发生的影响最为深刻，这个运动的领袖人物胡适博士和陈独秀先生宣称：文言已经过时，白话乃是合法的继承者”，还说：“当胡适博士于1922年在中华教育改进社济南会议上宣读他关于讲授中文和中国论文时，第一次唤醒了全国人民的注意，觉得需要改革这门学科的教学法”。赞扬胡适是改革教授法的“主要倡导者”。直到1941年，陶行知还给胡适写过信。说明胡适和陶行知从1915年同学之后，20多年一直没有中断过交往。这中间，他们的确在“庚款”处置问题上，在白话诗写作方面，在对中国社会病根的看法上，等等，有过不同甚至相左的看法，评析这些不同意见和分歧，必须依据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和具体事件的相关情况，客观平心而论，不能有“革命”和“反动”的主观先入之见。比如陶行知《另一看法》、《飞行有感》等一些新诗，其实是对胡适那段时间和蒋

介石政府走得太近的一种不满的流露。而 1937 年在美国，陶行知在云哥华中华学校朱广炜处看了胡适《秋柳》诗，“但见萧萧万叶摧，尚余垂柳拂人来。西风莫笑长条弱，待向西风舞一回。”就“为秋柳抱不平，便拿起笔来，代她写了一个答复：这是先生自写照，诬我献舞亦奇哉，君不见我鞭但一指，任尔东风西风都滚开”（10）。这里结合当时的社会背景和陶行知、胡适各自不同的人生经历，其实对“舞”字已产生了各自不同的理解，在各自的诗里，“舞”字已不是一个意思。平心而论，胡适的“舞”字，未必就是写秋柳的“献媚”，这个“舞”字，应该结合胡适的“只有拼命向前”和胡适连续不断的抗战演讲实践来解读，而且依当时的世界反法西斯形势，主张“东风西风都滚开”虽然很痛快，但“长鞭一指”，万众一心同抗日寇取得胜利，在当时还确实是艰苦的斗争才刚刚开始。

总之，在评析胡适、陶行知人生分歧时，客观一些，讲实事求是，不刻意放大，不主观臆断，不必为塑这一个形象的完美而随意贬损另一位他的朋友，才符合“21 世纪为胡适平反”的百姓愿望。胡适、陶行知，都应该得到徽州人的敬重，得到中国人的敬重，在先贤先哲队列中，胡适、陶行知，一个都不能少。

戊子冬于屯溪

（方利山，安徽歙县人，黄山学院研究员，安徽省文史研究馆馆员，安大徽学中心兼职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徽州文化之徽州文献、徽商、徽州历史人物。）

注释

- （1）朱泽普·陶行知先生年谱[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5.2
- （2）胡颂平·胡适先生年谱长篇初稿（第二册）[M]·台湾
- （3）胡云·陶行知先生改名字与胡适先生的缘结·故园徽州网·人文徽州 2008.10.
- （4）陶行知·行知诗歌集[M]·北京：三联书店，1981.
- （5）胡颂平·胡适晚年谈话录[M]·台湾
- （6）胡适·胡适书信集（上）[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9.371
- （7）石原皋·闲话胡适[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68
- （8）陶行知·陶行知全集（二）[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306
- （9）陶行知·陶行知书信集[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 1981，185
- （10）陶行知·陶行知诗歌集[M]·北京：三联书店，1981

胡适两次举荐张伯苓

梁吉生

胡适是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的好朋友，任过南开大学经济学院董事和南开大学校董。这两个董事会有过不少名人，如范源濂、颜惠庆、丁文江、陶孟和、范旭东、任鸿隽、穆藕初等。胡适是董事会中的活跃人物，每会必到，并曾带头发起捐资倡议以助南开。他尤信服张伯苓以私人力量为中国树立了一个优秀民办学校的榜样。1921 年 10 月，胡适与黄炎培出席济南的学制会议，两人谈起当时北京大学学生因要求废止讲义费发生的风潮，黄炎培说：“我们信仰一个学校的表示，是要看我们肯把自己的子弟送进去。现在我有子弟，决不向北

大送。”胡适也坦言：“老实说，我自己子弟，也不往北大送，都叫他们上南开去了。”

作为朋友，胡适与张伯苓相互为之倾倒，但他们也清醒地知道彼此间的不同之处。这种思想主张和价值趋向的差异，并不是互相排挤，至多有时两人施展一下幽默的挖苦伎俩而已。有一次，胡、张二人从天津市区乘车回南开大学，正赶上下起雨来，他们谈起了新文化运动。张伯苓以揶揄的口吻嬉说胡适的文学革命是一种打倒旧事物的运动，是在青年人未成长起来时就打倒了，好比在冬天把孩子们的旧衣裳都脱光，而让他们去想象外国漂亮的衣服。胡适则还以幽默的讥嘲，说北方人爱吃大蒜，喝茉莉花茶，禁欲主义延宕了中国现代化，还讽喻张伯苓办的南开是基督教青年会式的行善。

“哲人重道义，朝贵不足糜”。胡适在蔡元培改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一事上，曾挺身而出，仗义执言，对蔡元培的做法发出“不可不奉告”的长信。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是北洋政府时期设立的，负责保管、分配和监督使用美国退还庚子赔款的机构，由美籍和外籍著名人士组成。当年张伯苓和蔡元培都是该会董事，还在1928年6月的第四次年会上两人分别当选董事长、副董事长。时隔不到一个月，蔡元培在未征询董事长张伯苓意见的情况下，即在国民政府会议上，提出改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案，并且草拟了新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章程。他在议案中指称，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是由贿选总统曹锟以大总统命令委派董事组织成立的，并且“所任命之董事中，有为国民政府所通缉者，有为拥护贿选之官僚与学阀者，皆不当任其主持国民革命之教育文化事业”。蔡元培自行拟定了新的董事会名单，除保留他本人及四五个人士外，郭秉文、张伯苓等六位外籍人士皆在罢免之列，换上的则是国民党官员，其中郭秉文由汪精卫代替，张伯苓由陈立夫代替。事前并未予闻蔡元培此项改组计划的该会董事胡适，当即写了长信给蔡元培提出质疑。首先质疑的是蔡元培废去原董事会章程中关于“董事缺额由董事会自选继任者”的规定，擅自改为“由大学院呈请政府任命”，胡认为这“是根本推翻此原则”；第二质疑蔡元培“今忽根本推翻董事会之组织，又并当日所声明不反对者而一并罢免之，又必明文罢免一年前已辞职并由先生继任之黄炎培君以快意，似殊令局外人不能了解”；第三质疑，文化基金董事会“开办以来，始终任事最勤劳、最熟悉者为张伯苓、周寄梅、颜骏人三君。今此三人皆罢免……似非维持之意”。胡适最后恳切地表示：“张伯苓管会中会计多年……是中、美董事会都信服的人，似应留他在董事会。我仔细想，只有我自己辞职，遗缺推荐张伯苓先生，请先生千万俯允所请。”这是一封胡适自认为“一半为爱护基金董事会，一半为欲妄想挽回国际信用于万一”的信。胡适不惜以身保荐张伯苓。但是，身为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委员和大学院院长的蔡元培听不进去胡适的劝告和诚恳地请求，断然表示：周寄梅、张伯苓“不能仍旧”，你胡适也不必因此而让贤，即使“让出以后，亦未必即以周、张诸君补入也。”胡适对张伯苓的举荐，因蔡元培坚决反对而告败。

这是一封胡适自认为“一半为爱护基金董事会，一半为欲妄想挽回国际信用于万一”的信。胡适不惜以身保荐张伯苓。但是，身为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委员和大学院院长的蔡元培听不进去胡适的劝告和诚恳地请求，断然表示：周寄梅、张伯苓“不能仍旧”，你胡适也不必因此而让贤，即使“让出以后，亦未必即以周、张诸君补入也。”胡适对张伯苓的举荐，因蔡元培坚决反对而告败。

胡适第二次举荐张伯苓是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占领北平、天津，并对南开大学狂轰烂炸。北大、清华和南开三校被迫南迁，组成长沙临时大学。8月28日教育部指定张伯苓、梅贻琦、蒋梦麟为长沙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并且希望推举常委负责人。当时三校仓促联合，师生正从四面八方汇集长沙，校舍安置、机构组织、院系合并、课程排定、教员分配……百业待举。“家有千口，主事一人”。三校推举总负责人实是当务之急。8月30日，胡适致函张伯苓、梅贻琦，借转达仍在杭州养息的蒋梦麟的意见，全力推荐张伯苓主持长沙临大的工作。胡适信中表示，蒋梦麟有信给我，他的意见是：“伯苓先生

老成持重，经验毅力为吾人所钦佩，应请主持一切”。胡适接着谈自己的意见：“我们都赞成此意。所以我把此意转达两公，伏乞两公以大事为重，体恤孟邻兄此意，不要客气，决定推伯苓先生为对内对外负责的领袖，倘有伯苓先生不能亲到长沙时，则由月涵（梅贻琦）兄代表。如此则责任有归，组织较易推行。千万请两公考虑。”这封信既显示了北大在联合办学中的胸襟，也从中看出胡适对张伯苓的一贯信任和倚重。

“始知君子心，交久道益彰”（唐·孟郊）。张伯苓晚年，胡适曾著《教育家张伯苓》专文，给其一生所从事的教育事业很高评价，称赞张伯苓是“中国现代教育的创造者”，“南开与张伯苓两个名字，在中国教育史上永占光荣的一页。”

胡锺吾与胡适的老乡情结

汪汉水 耿培炳

胡适是近代中国最有影响的思想家和学者之一，也是世界文化名人。他曾任过驻美大使、北京大学校长、中央研究院院长等职。胡锺吾曾任宣城、泾县县长，皖南、浙西、江南三行署参议，国民党“国大”代表，绩溪县参议长。在台期间，除参加政治活动以外，还研习集右军书法，名震台湾内外。

胡锺吾和胡适是老乡，同是安徽绩溪人。宋绍熙年间，有一位名叫赖文正（也称布衣）的风水先生，曾涉足绩溪，云：“绩溪形势若牛眠，荆州九华为头角，翬岭作背分南北，大会金山是尾蹠，山川雄奇秀异，境内成三太极，五百年中出将入相，千年后人文之盛，莫可量也。”由是产生了“绩溪牛”的说法。^①按此说，胡锺吾的家乡是绩溪岭南的荆州上胡家，处于绩溪牛状的头部；胡适的家乡是岭北的上庄，处于绩溪牛状的尾部。这绩溪东西两端的村庄都逾千人，从古至今，都属明经胡氏的后裔在此居住。胡适生于1891年12月17日，胡锺吾生于1906年12月25日，少胡适15岁。胡适是绩溪明经胡氏第42世，胡锺吾是第40世。^②按照当时徽州人按辈份称呼的习惯，胡适尽管年龄长于胡锺吾，还要称呼锺吾为叔祖。但彼此有过约定：由于各自都有所长，都是明经胡氏后代，按辈份相称有些别扭，就称对方“先生”为好，后均按此称呼对方。由于胡适和胡锺吾是同乡，又是同姓同宗，又都是国民党“国大”代表，故交往甚多，关系密切，在人生旅途中凝结了深厚的老乡情结。

胡锺吾和胡适的交往，起初也经历不快之事，起因是为仁里的程东屏（宗鲁），东屏先生是胡锺吾在安徽二师的老师，也是绩溪享有名气的书法家。民国二十（1931）年，两人参与创建了“绩溪止园公墓”。东屏到上海拜望胡适，不知是胡适忙于工作，还是其他原因，对这位绩溪清末的“秀才”闭门不纳。东屏回到学校，同胡锺吾讲起此事。一向“尊师重道”的锺吾认为这是对老乡和自己老师的极大侮辱，心存不满。后来，胡锺吾为此事还责怪胡适，胡适感到内疚，请胡锺吾向东屏先生表达歉意，化解了老乡之间的负面看法。

胡锺吾的老家荆州，自清初属安徽绩溪和浙江昌化两县共管之地，三百年以来疆界纷争不断。民国十九（1930）年，绩溪掀起荆州勘界运动，公推胡锺吾为民意代表，至皖浙两省府和南京政府上访，强烈要求将荆州统归绩溪管辖。此事引起绩溪各界人士以及旅外人士的大力声援和支持。作为江南胜地的上海，离绩溪不远，很多绩溪人都涉足此地求学、经商和发展事业。胡适是1891年生于上海，并在此读书、讲学，著书立说；汪孟邹、汪原放等人在此创立“亚东图书馆”；还有很多商人都行贾此地，设立鸿运楼、大中华、大富贵等徽菜馆120余家。为凝聚旅沪绩溪人，由胡适和汪孟邹等人发起成立了“绩溪旅沪同乡会”。荆州的勘界运动，事关安徽绩溪县域，自然引起包括绩溪旅沪同乡会在内的多个安徽旅外同乡会

的关注与支持。胡锺吾光临上海，向绩溪同乡会通报此事，受到胡适和汪孟邹等人的热情接待，大家一起在饭店进餐，合影留念。饭后即撰电文，胡适是首位在电文上签字。绩溪旅沪同乡会，率 8620 个绩溪旅沪人士共同通电声援，亚东图书馆、鸿运楼、胡开文沅记、满江春等 30 余个单位和店号以及 100 余人还捐银元支持。在县内外各界人士的同力合作之下，荆州疆界官司从地方打至中央，后经国民政府兼行政院长蒋介石裁定，将荆州全境划归安徽绩溪统一管辖。^③

胡锺吾之父胡商岩，继承祖志，累世积善，笃行孝义，修筑道路、关隘、桥梁、碣坝、学校、祠宇、茶亭、义所、孤冢等工程不下百十处，很多都是自己出资而造福社会，有“一乡善事，乐善不倦”之雅誉。其周夫人，出身闺秀，但井臼躬操，佐理家政，使夫无内顾之忧，并出售山木和自己珍藏的昌化鸡血石 300 余颗，全力支持丈夫的善举，诚当世不可多得者。当年，胡锺吾先后担任宣城、泾县县长和皖南、浙西、江南行署参议，结识了很多国民党政要和文人，尽管年仅 40 来岁，但受人器重。1942 年 12 月，胡锺吾父亲商岩和母亲周夫人都年届七秩，锺吾为父母举办“七秩双庆”，贺寿之人达数百人。其后，又编撰了胡商岩《三十年来经办社会公益事业回忆录》，蒋介石为此亲自题字：“积善康民”，国民党元老许世英、陈诚、于右任都为其题字。胡适对这位长他三辈的胡商岩更敬重有加，题“功在桑梓，敬题，商岩先生回忆录，胡适。”十五个字的条幅，以示对胡商岩积善行德行为的肯定。^④

1945 年秋，抗战取得了胜利。国民党政府为了实施宪政，推行地方自治，各县市选举参议员，成立参议会。次年的 3 月 7 日，胡锺吾被选为绩溪县参议长。1947 年 1 月 1 日，国民党政府公布《中华民国宪法》，并定于同年 12 月 25 日为行宪期，乃于 10 月间举行行宪国民代表大会，故全国进行“国大”代表的选举。绩溪为一个选区，代表名额 1 名。当时登记参选的有胡锺吾与担任广德县长和绩溪县党部秘书的唐少澜二人，竞选十分激烈，后胡锺吾当选。致使胡锺吾当选的主要因素有二，一是共产党、游击队暗中为他助选；二是得到时任北京大学校长胡适的支持。胡适得知胡锺吾参选，专诚致函祝贺：“锺吾先生：本县行宪国大代表选举，先生肯出来候选，我很高兴。预祝先生竞选成功！适之，三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胡适在上海鸡鸣寺写好此信，即派人送南京相府营 6 号柏园，请洪范五先生收转。此时胡锺吾因事到上海，又接李宗仁电邀北上，洪将此信寄上海亚东图书馆汪孟邹代转。汪接此信后，电告北平的胡锺吾，胡即请孟邹代阅处理，孟邹就送上海《大公报》编辑部。十一月上旬，上海《大公报》以花边新闻大字刊出《胡适推崇胡锺吾》，被蒋介石看到后，派吴铁城秘书长赴柏园告知胡锺吾，并在中央党部晋见他。此消息传出，无疑是对锺吾的选举给予莫大的帮助，是年冬，胡锺吾顺利当选。^⑤

1946 年 3 月，胡锺吾被选为县参议长，正值绩溪流行水肿病，夺走了很多人的生命。绩溪原县长胡运中等发起筹建国立卫生院，以救死扶伤、服务社会。由于抗战刚结束，办院经费无法筹措，请胡锺吾助一臂之力，胡锺吾呈请安徽省救济分署拨给病床 25 张，竟遭到叶元龙署长婉拒。胡锺吾毅然赶到南京面见胡适，晤叙桑梓困状，胡适当承致函国民政府救济总署霍局长，乃蒙电令安徽省分署拨给美援病床 50 张及医药、器材全套设备和建院工程补助米等，使医院在短时期内遂以告成。^⑥

1948 年 3 月 29 日，国民党举行“行宪国大”。之前举行“国大”预备会议，通过主席团名单和国大议程。胡适作为国大会议临时主席，胡锺吾作为国大代表均出席了会议。胡锺吾代表首先发言：“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应握有九权，要求国民政府还政于民。”此言一出，震撼在场数百名记者和全体国大代表，丈家都惊慌失措，嘘声四起，连主持会议的胡适都感到茫然。而胡锺吾接着说：“我要代表四亿五千万人，在此郑重要求国民政府还政于民，反对立法院三读通过的国大组织法第五条的寡头政治，请本会主席依法接收。”于是，蒋中正主席与胡适主席均起立，表示同意，会场寂静无声。胡适说：“民主政制，是多数人尊重少

数人意见，少数人服从多数人决议。象今天胡代表的发言，大家竟不守秩序，嘘声四起，剥夺胡代表的发言权，这是乡民代表会议都不会有的，县议员、省议员是绝对没有的事。但很不幸，居然发生在最高民意代表的国民大会。我以主席的名义裁定：今天可以行使九权，请洪秘书长和会场干事注意，如有不守会场秩序者，请他出去。现在请胡代表继续发言，有不同意见，应递发言条，待胡代表发言后，依次发言可也。”胡锺吾接着说：“刚才蒋主席、胡主席已同意本会开会期间行使九权了。此届代表应握有九权法源，不受宪法冻结创制复决两权之限制，今天开会至闭会之日，国民政府应为看守政府，所有国家大事，均由国民大会决议，函国民政府交五院执行。但蒋主席是总统候选人，国民政府不必办移交手续，祇请蒋主席和胡主席表示交接即可。”而后，胡锺吾又就国大会议主席团的人员组成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建议在现有的 25 人增加到 85 人，受到大家的一致赞同。至此，胡锺吾在国大预备会上的二个提议都获得通过。当时，《救国日报》为行宪国民大会行使九权，誉为“行宪之光”作了专题报道。^⑦

在国民党国大会议召开之际，还发生了另外一件事情令胡适感到头痛，那就是蒋介石假让总统。当时国大会议，选举第一届行宪总统、副总统。蒋表面上把总统候选人让给胡适，自己当副总统兼行政院长，并派人多次做胡适的工作。致使胡适诚惶诚恐，一再辞谢美意，但蒋不行，胡适不得已答应三天答复。在这三天之内，他请知己会商，有支持的，也有反对的，更使他如热锅上的蚂蚁，在公馆的客厅内来回踱步，拿不定主意。夫人江冬秀虽属大家闺秀，究竟是个农村妇女，根本插不上嘴。兹事重大，又不能公诸与论，微询民意。后来想到征求老乡胡锺吾的意见，派车去请他当面请教。锺吾意感此事重大，不好随便说，在胡适亮出心迹后，锺吾才说明了胡适不宜当总统的多项原因，使胡适茅塞顿开，坚定了自己不当总统的意愿，回绝了蒋介石的提议。1948 年 4 月 1 日，胡适主动和吴敬恒、于右任等 200 余人联名推举蒋介石为本届总统候选人，蒋也获得多数票当选。善于搞学术研究的胡适此时才感觉到政治的残酷，也庆幸自己没淌选总统的洪水，在内心感谢锺吾的指点，使自己度过了一个难关。

1949 年，胡适和胡锺吾相继去了台湾。胡适安顿好家属即去美国讲学。胡锺吾继任“国大代表”等职，政余，致力于集王羲之字，潜心研究书法，并联络乡亲，组建绩溪旅台同乡会。1952 年 10 月，胡适回到台湾讲学。1953 年 1 月 3 日，旅台绩溪同乡，在台北市召开绩溪旅台同乡会筹备会，商定于 1 月 10 日在台北市泉州街铁路饭店举行茶会，欢迎胡适回台讲学，并祝贺其 62 岁生日。当时到会祝寿的乡亲达 52 人，大家身居异地，乡音未改，首次聚会，又有异国他乡的胡适参加，格外亲热。胡适即兴题书：“努力做徽骆驼”墨宝一幅，赠会纪念，并殷切叮咛到会同乡要坚守徽骆驼、绩溪牛勤劳坚忍的本色。^⑧后台北市绩溪同乡会（法定名称）奉准正式成立，胡锺吾等人将胡适写的墨宝复印精裱成锦轴，分发全体旅台同乡，作为本会的精神标志。此前的 1946 年秋，胡适在南京徽州会馆，也题过“我们是徽骆驼”六个大字。

1954 年 2 月 18 日，胡适离开纽约来到台北，准备出席“国大”第二次大会，住在台北市福州街钱思亮家，胡锺吾和其他老乡都去看他。3 月 22 日，“国大”会议正式召开，两个老乡又在会上见面。4 月 7 日，胡适启程去美国，胡锺吾等人去松山机场送行。1958 年 4 月 8 日，胡适回到台北，准备参加中央研究院第三次院士会议，到松山机场迎接的台湾各界人士达 500 余人，胡适之子胡祖望夫妇和胡锺吾也在其中。1958 年，胡适回台任职，住进了南港中央研究院的宿舍，结束了近 10 年的旅美生活。胡锺吾住在台北市富锦街，两人住地相距不远，交往较为方便。此时的胡适是中央研究院的院长，又在同年的 12 月担任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整天忙于政务和著书讲学，奔走于国民党要员和文人、朋友之间，住在罗斯福路的儿子胡祖望夫妇也不时来看望他，胡锺吾也经常光顾与他叙谈。此时的锺吾，除以国大代表和宪政指导委员参与台湾的政事以外，他以大部份精力投入到集右军书法上面，自己花

钱成立了“右军书法研究出版社”，精研集王羲之字，在先父胡商岩集《大同篇》、《魏徵十思疏》、《孝经》等文的基础上，自集右军书70余种，每件书法的意、形、体、势，莫不心领神会，酷似真迹，经当代书家许世英、于右任二位书家鉴评后影印行世，分送海内外八十余国，数逾万件，极受海内外书道名士的尊崇。也深得蒋介石、许世英、于右任等一大批政要和书家的赞誉。胡适对胡商岩、胡锺吾二位宗亲在书法上潜心钻研、执着追求的精神极为佩服，于1959年元旦题跋送与胡锺吾，以示鼓励。跋曰：“绩溪胡商岩先生穷五十年之力，集王右军字成大同篇六十四字，魏徵十思疏一百九十八字，孝经一千三百字，皆未完成。民国三十年以后，由其令子锺吾续集，凡十八年，始完成此三件。锺吾又集补洛神赋阙文一百二十八字。胡氏父子积两世六七十年之功力，成此美事，最可钦佩。中华民国四十八年元旦，绩溪胡适敬记。”^⑨此外，胡适还资助胡锺吾台币3万元，以帮助他在台北及外国的展览。

1960年，是胡适的七十大寿，也是其父胡铁花一百二十十大寿，绩溪旅台同乡会特举行盛大酒会祝贺其父子双寿，并请胡锺吾集右军书恭录其父胡铁花嘉言“学为人诗”影印数千份作为寿礼，胡适极为高兴，开怀畅饮，与老乡欢聚至深夜，他称此日是他来台后精神最为愉快之时。1961年7月26日，台北市绩溪同乡会奉台北市政府核准正式成立。选举产生理、监事会，汪荷之被选为理事长，胡锺吾被选为常务理事，唐子宗为常务监事。大家有感于旅台日久，思乡心切，尤其子女繁衍，对故乡文献颇多茫然不知其本源，决定重印《绩溪县志》，以振兴乡人后代爱国、爱乡的情操。这件事得到了胡适的大力支持，他除捐赠自己珍藏的书籍以外，还以自己的名义，向国立故宫博物院协商：一是借《绩溪县志》（乾隆版）；二是用博物院的显微摄影机，将志摄成胶片，以便印刷。自己还函托驻日大使张伯瑾，将日本东京图书馆仅存的《绩溪县志》（嘉庆版）拍成胶片，两部县志合并重印。胡适既联系资料，并叮嘱大家积极进行，早日完成此事，并允为作序，遗憾的是，他于次年2月24日去世而未实现，封面“绩溪县志”四字，是集胡适遗墨的。胡锺吾为编纂成员，并同程敷堂二人负责乾隆、嘉庆县志的影印工作。八十余位旅台同乡捐助了资金，其中胡锺吾捐助5千元，其子平夷、国光也捐了钱。

1962年2月24日，胡适在中央研究院主持第五次院士会议结束，举行院士招待会上，以心脏病突发逝世。台北市绩溪同乡会常务理事胡锺吾得悉后，即时赶赴中研院长寓所，协助江冬秀夫人处理后事。蒋介石下令成立治丧委员会，指派副总统陈诚为主任委员，主持胡适的治丧事宜。丧委会共103人，江冬秀夫人和台北绩溪同乡会理事长汪荷之和常务理事胡锺吾均在其列，参与治丧事宜。

突如其来的噩耗，使绩溪旅台同乡痛惜万分。同乡会急于2月26日召开理监事联席会议，决定本会参加公祭事宜：一、在《中央日报》刊登广告，通知同乡参加公祭。二、致献鲜花大花圈、挽联。并请理事长联络治丧会，确定本会公祭时间、刊登公告。本会挽联由曹升主笔。理监事会还向国民政府提出三项建议：一、请政府明令褒扬胡适博士，并将其生平事略宣付国史馆；二、请政府国葬胡适博士……三、请政府明令将中央研究院胡故院长之寓所，保留胡故院长生前景色，改为胡适纪念馆，陈列胡故院长之著作遗物，并就该寓所的后园中修建厝墓，以凭景仰。这份决议立即得到政府的采纳实施。^⑩

当时，围绕胡适遗体火化还是土葬发生了一场论争。在胡适治丧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103位治丧委员中，有70多人依据胡适遗嘱而坚持火化，并作出初步决议。而江冬秀则坚决反对火化，但她一介女流，无力改变会议初步决议。于是，商请胡锺吾，以胡氏宗长、绩溪同乡会常务副理事长的身份，走访了时贤谷正纲、董作宾、延国符等人，形成共识，主张让胡适这个伟人全寿全终，坚决反对火化。三位同胡锺吾一起，在治丧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据理力争。胡锺吾还代表胡适家属在会上宣称，如政府不答应土葬，那就以绩溪同乡会或家属私人安排胡适的后事。张群即席面示：“适之先生功在文化，我以‘总统府秘书长’的身份代表‘总统’裁定，适之先生善后事宜，一切都照胡府意思决定，只可土葬，不能火葬。”至

此，一场火土之争告一段落。接着是选墓地，选择在胡适生前同胡锺吾两人多次察看定的台北南港旧庄。胡适停柩时的“点主”，是胡适生前友好杨亮功、罗家伦、陈雪屏等。晚上守灵，都是胡锺吾安排其子平夷、国光负主责。(11)

胡适逝世后，其儿胡祖望定居于美国，江冬秀独身在台，有中央研究院的照顾，同乡族人胡祖亮，则侍奉勤笃，老夫人亦以族亲晚辈相待。胡锺吾也不时前去看望。1975年秋，江冬秀逝世，胡锺吾协同中研院办理丧事，以台北绩溪同乡会的名义发讣告，还请到严家淦及五院院长亲临致祭，葬礼办得隆重体面。胡锺吾还亲撰碑文悼之：“国民代表主席团、总统府资政、中研院院长，绩溪胡适之先生辞世十三年越六月，德配江夫人冬秀逝于台北，享年八十有七。呜呼！半世纪来，先生为中国新文化奠基，源于家学，先生仁亲至孝，以台湾为第二故乡，不以三十六博士为骄傲。夫人德齐孟光有荣焉。子二，长祖望，任驻美经济参事，闻耗奔丧。次思杜，已故。女幼殇。孙复留美康乃尔大学。民国六十四年九月二日，遵嘱殡于南岗墓园。”(12)

胡适夫妇的辞世，对台湾绩溪旅外乡亲是莫大痛苦，人们对他的敬仰和怀念之情都铭记在心，大家通过举办各种活动来缅怀和纪念这位绩溪的精英。每逢清明节和胡适的生（忌）日，胡锺吾以及绩溪同乡会的人都莅园扫墓祭吊。1991年元月29日（农历12月17日），正值胡适诞辰100周年。台北市绩溪同乡会为其举行了二项纪念活动：一是在南港墓园举行祭奠大礼。凡家住台北的同乡会理监事及乡亲，皆自备祭品于上午八时前到达南港墓园致祭。胡锺吾尽管是胡适的长辈，亦本着“人去为大”之义，亲往参与。二是在台北国立历史博物馆举办“胡适百年纪念文物展”。他又将家中数十件与胡适交往的文物交给吴大猷馆长参加布展，以提升展览的档次。在展览开幕式上，首先是吴馆长致词，接着胡锺吾代表同乡会发言：“我首先感谢吴院长的大力支持，同时要把胡适托咐的三句话在今天的开幕式上予以告示。第一，‘打倒孔家店’不是胡适先生说的；第二，‘把线装书丢到茅厕’这句话不是胡适先生说的；第三，‘五四’运动发生时，适之先生不在北京，并未亲身参与。这三件事不符史实，流传甚久，误导人心，影响深远的事事非非，不能让其一错再错地错下去。适之先生生前和我讨论问题时，就交待我将来遇到有机会定要帮他澄清一下。今天是适之先生的百年诞辰，所以我希望所有在座的新闻媒体代表，发挥新闻道德，公正播布，以正视听，以免永远错误下去。”(13)话毕，他如释重负，总算完成了胡适生前的托咐，可以告慰这位老乡在天之灵了。

2005年9月19日，这位曾送走胡适夫妇的胡锺吾也去世了，终年100岁。现在，一代伟人、一代耆宿都已仙逝，但他们“生为绩溪人，死为绩溪鬼”的老乡情结还永远存在。

作者介绍：汪汉水，原绩溪县档案局局长、档案馆馆长、名人档案馆馆长、方志办主任、党史办主任。

① 《绩溪荆州胡善述堂家史》

② 《上川明经胡氏宗谱》、《荆州上胡家明经胡氏宗谱》

③ 《荆州复界运动专刊》

④⑤ 《荆州文献资料》第一册

⑥ 台湾出版的《中国一周》第634期《胡适博士上世源流及生年事迹考》民国

五十一年六月十八日

⑦ 龚德柏记的“行宪史料”《南京国大预备会议：行使九权纪实》

⑧⑩ 绩溪旅台同乡会编撰《绩溪县志》(附编)

⑨ 《绩溪胡氏集补澄心堂、洛神赋考据史料》

(11)(13) 绩溪旅台同乡会原理事王开钟编撰的《天道好还·胡适百年展》

胡适与张爱玲的君子之交

姚承秀

胡适这位 20 世纪“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创始人、大学者和政治风云人物，与四十年代在上海崛起的旷世奇才女作家张爱玲，年龄、经历等都相差迥异，他们之间曾经有过怎样的缘份和交往呢？

首先，胡适与张爱玲的交往是胡适对张爱玲才华、人生的理解和欣赏，建立在胡一贯的对人对事客观平等公正的大家风范和气度上。

胡适对张爱玲的理解和欣赏

1952 年，张爱玲离开大陆赴香港后，写作了《秧歌》和《赤地之恋》两部长篇小说，先后在《今日世界》连载，同年出版英文本和中文本。1954 年 10 月 25 日，离开大陆后住香港三年又迁居美国的张爱玲自称“很冒昧的写信”给当时也在美国的胡适，谈到“很久以前读到您写的《醒世姻缘》与《海上花》的考证，印象非常深，后来找了这两部小说来看，这些年来前后不知看了多少遍，自己以为得到不少益处。我希望您肯看一遍《秧歌》。假使认为稍稍有一点接近‘平淡而近自然’的境界，那我就太高兴了。”第二年（1955 年）1 月 23 日，胡适在日记中写道：“去年十一月，我收到香港张爱玲女士寄来她的小说《秧歌》并附有一信。（信附上页）我读了这本小说，觉得很好。后来又读了一遍，更觉得作者确已能做到“平淡而近自然的境界。近来所出中国小说，这本小说可算是最好的了。……我答他一信，……我说，“如果我提倡《醒世姻缘》与《海上花》的结果单只产生了你这本小说，我也应该很满意了。”

‘胡适对《海上花列传》（《海上花》旧称）的考证，早在 1926 年，他评价“《海上花》的长处在于语言的传神，描写的细致，同每一故事的自然地发展；读时耐人仔细玩味，读过之后令人感觉深刻的印象与悠然不同的余韵。鲁迅先生称赞《海上花》‘平淡而近自然’。这是文学上很不易做到的境界。”由此可看出胡适对张爱玲文学上的评价是很高的。同时在此信中，胡适还问张爱玲：“你在这本小说之前，还写了些什么书？如方便时我很想看看。”

张爱玲在 1956 年 2 月 20 日给胡的回信中写道：“收到您的信真高兴到极点，实在是非常大的荣幸。最使我感谢的是您把《秧歌》看得那样仔细。您指出七六页叙沙明往事那段可删，确是应当删。……我寄了五本《秧歌》来。别的作品我本来不想寄来的，因为实在是

坏一绝对不是客气话。但是您既然问起，我还是寄了来，您随便翻翻，看不下去就丢下。……”

胡适当然很忙，对张爱玲四十年代在上海的顶巅作品是否阅读和研究，似无记载。但他对后来生活在美国的张爱玲，给予了极尽可能的关怀和帮助。据张爱玲在“忆胡适之”文中写道：“同年十一月，我到纽约不久，就去见适之先生，……适之先生穿着长袍子。他太太带点安徽口音，我听着更觉得熟悉。她端丽的园脸上看得出当年的模样，两手交握着站在当地，态度有点生涩。……使我立刻想起读到的关于他们是旧式婚姻罕有的幸福的例子。……喝着玻璃杯里泡着的绿茶，我还没进门就有的时空交叠的感觉更浓了。……”

张爱玲对胡适的景仰和尊重

随后张爱玲写道她童年时即接触到的《胡适文存》是在父亲窗下的书桌上看的。《海上花》似乎是我父亲看了胡适的考证去买的。她还写道：我姑姑有时问我父亲借书看，有一次她还不好意思地说：这本《胡适文存》还是他的。她和我母亲跟胡适先生打过牌。战后胡适回国的照片，不记得是下飞机还是下船，笑容满面，笑得像个猫脸的小孩，打着个大圆点的蝴蝶式领结，她看着笑了起来说：“胡适之这样年轻！”这里，我们从张爱玲对幼时的阅读及遥远的父母亲和姑姑与胡适有关的往事的回忆，似乎已经牵出了张爱玲与胡适之间的缘分的线头。但是上天似乎总是吝啬的，不是说缘慳一面吗？张爱玲和胡适虽然有数面之缘，但毕竟由于历史的时空的和个性的原因，没有更多的接触和了解。直至1962年胡适在台湾宴会上演讲后突然逝世，张爱玲写道“只惘惘的。因为本来已经是历史上的人物？想着胡适也就是从前的所谓无疾而终，是真有福气。以他的为人也是应当的。”

张爱玲就是以这样一以贯之的“平淡”的手法写出了她对胡适的深深的景仰之情。她后来又去看过适之先生一次。写道：“跟适之先生谈，我确是如对神明。较具体的说是像写东西的时候停下来望着窗外一片空白的天，只想较近真实。”此次虽然由于张爱玲的不善言谈，气氛不十分热烈，但感恩节那天胡适还打电话来，邀张跟他们吃中国饺子，张告诉他刚回来吃了吐了，也就算了，“本来是因为感恩节，怕我一个人寂寞。”当然这仅是胡适关心他人，特别是关心有才华的努力上进的晚辈之一例。但给予独在异乡为异客的曾经辉煌的张爱玲的温暖也是不言而喻的。更令人感动的是有一天胡适竟然亲临张所住的救世军职业女子宿舍，看望张，张请他到客厅去坐，那是一个黑古洞洞的大礼堂，没什么人，空落落的放着些沙发，“干事们鼓励大家每天去喝下午茶，谁也不肯去，但是适之先生直赞成这地方很好。”“坐了一会出来，他一路四面看着，仍旧满口说好，不像是敷衍话，也许是觉得我没有虚荣心。”“我送到大门外，在台阶上站着说话。……适之先生望着街口露出一角空濛的灰色河面，……他围巾裹得严严的，脖子缩在半旧的黑大衣里，厚实的肩背，头脸相当大，整个凝成一座古铜半身像。……站久了只觉得风飕飕的。……仿佛有一阵悲风，隔着十万八千里从时代的深处吹出来，吹得眼睛都睁不开。那是我最后一次看见胡适先生。”笔者以为张爱玲的这段经典描写，生动而深刻地印证了他们之间的心灵默契和相通。

1956年9月9日，已离开纽约数月的张爱玲曾写信给胡适，告诉他现已住在Macdowellcolony，并已与美国作家赖亚结婚，他向胡适报告了她的写作情况和计划，写道“我想应征Gvqqenheimand Eugevef.Saxton fellowships.二者之间如果有一个入选，能够得到一年的生活保障，可以在这期间专心的写这篇小说，对于我是极大的帮助。”请求胡给其作申请参加的保证人。1958年四月，胡适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定居台北南港。当年，张为了保证写作的基本生活，又申请到南加州亨亨屯.哈福特基金会去住半年，写信请胡适作保，他答应了，“顺便把我三四年前送给他的那本《秧歌》寄还给我，经他通篇圈点过，又在扉页上题字。我看了实在震动，感激得说不出话来，写都无法写。”论张爱玲的才华和成就，

是一个十分矜持的人，但处于困境中的她，对胡适的知遇之恩和雪中送炭，自然更是铭记在心了。

张爱玲祖辈与胡适父辈的渊源

说起来张爱玲的祖辈与胡适的父辈的确有些渊源关系。张在她的《忆胡适之》文中写道：“他讲他父亲认识我的祖父，似乎是我祖父帮过他父亲一个小忙。我连这段小故事都不太记得，仿佛太荒唐。原因是我们家里从来不提祖父。……适之先生也提到不久以前在书摊上看到我祖父的全集，没有买。”张爱玲的祖父是晚清名臣张佩纶（1848—1903），1884年（光绪10年），因玩忽职守使福建海军溃于一旦，受革职充军处分，1888年获释后，任李鸿章幕僚，并又成为李的女婿。因此张爱玲的母亲即是李鸿章的女儿，李鸿章则是张的曾外祖父。但是胡适并没有把张显赫的身世与帮张产生必然的联系，而只在1955年11月10日的日记中写道：“Called on miss eileen chang 张爱玲’ Author of. 《秧歌》。始知她是丰润张幼樵的孙女。张幼樵（佩纶）在光绪七年（1881）作书介绍先父（胡传，字铁花）去见吴宓斋（大澂）。此是先父后来事功的开始。幼樵贬谪时，日记中曾记先父远道寄函并寄银二百两。幼樵似甚感动，故日记特书此事。（《润于日记》有石印本）。幼樵遗集中竟收此介绍一个老秀才的信，一我曾见之，一可见他在当时亦不是轻易写此信也。”

张爱玲译著《海上花》

一代大师胡适生于1891年，歿于1962年；世界女作家张爱玲生于1921年，歿于1995年。他们是完完全全的两代人，却在人生的轨迹上有过短暂的交汇。胡适的早逝，对于独在异国漂泊的张爱玲来说无疑是一个重大的损失，虽然张是用她一贯的平淡的笔法来表达这样深刻的哀痛，虽然人生对于张爱玲来说“是一件华丽的袍子上面爬满了蚤子”，这样的无奈，但是对于大师和心中的偶像神明的崇敬和怀念一直延续在她的生命之路，这可以张花数年心血与时间译注胡适早在1926年就着力推崇的晚清吴语小说《海上花列传》为佐证。在1981年由台湾皇冠出版社出版的国语本《海上花》中，张将胡适写于1926年的《海上花列传序》节录载于书的首页，而将自己的“译者识”放在其后，开宗明义即写道：“半世纪前，胡适先生为《海上花》作序，称为‘吴语文学的第一部杰作’。”并谦称：“一九二六年亚东数据出版的标点本《海上花》有胡适、刘半农序。现在仅存的亚东本，海外几家大学图书馆收藏的都算是稀有的珍本了。……迄今很少人知道。我等于做打捞工作，把书中吴语翻译出来，像译外文一样，难免有些地方失去语气的神韵，但是希望至少替大众保存了这本书。”

张爱玲对胡适却也并非盲目崇拜言必听之。张爱玲虽然十分尊重胡适的见解与观点，但胡适是不主张改译《海上花》的。译好还是不译好？张爱玲不明确表态，她不说胡适意见不对，只采取实际行动也就是译的办法，这需要勇气，因为要同她所敬重的权威和以权威为代表的流俗意见直接对抗，她的聪明之处在于只做，不争论，为了使这本小说达到普及的目的，只有改掉书中的方言。胡适也承认“方言文学读者太少”，但是改译失去神韵，势难两全。《国语海上花列传》（《海上花开》《海上花落》）已于1995年8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达到了更大范围的普及。

沧海桑田，流年逝水，斯人均已故去。但胡适与张爱玲高洁的忘年君子交，他们所创造的精神财富，将永留人间。

参考书目：

《胡适日记全集》第九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作别张爱玲》（文汇出版社陈子善编）

“致胡适”（张爱玲）

“谈张爱玲注译《海上花》”（钱伯城）

《张爱玲传》（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海南出版社余斌）

“忆胡适之”（浙江文艺出版社《张爱玲散文全编》）

日本胡适研究论著目录稿续编（1920～1969）

石立善 编

本稿乃第三期所载《日本胡适研究论著目录稿（1970～2008）》之续编，收录1920年至1969年间日本学界发表的胡适研究论著，类目则大致依据前稿而略作细分。又，文末附录前稿补遗。

[专著]

[\(1\) 尾坂徳司《中國新文學運動史——政治と文學の交点・胡適から魯迅へ》](#)
東京：法政大學出版局，1957年11月。

[论文]

- (1) 青木正児《胡適を中心に渦いてゐる文學革命（上）》
《支那學》第1卷第1號，1920年9月。
《支那文藝論叢》所收，京都：弘文堂，1927年4月。1952年6月再版。
《青木正児全集》第2卷所收，東京：春秋社，1970年7月。
- (2) 青木正児《胡適を中心に渦いてゐる文學革命（中）》
《支那學》第1卷第2號，1920年10月。
前掲《支那文藝論叢》、《青木正児全集》第2卷所收。
- (3) 青木正児《胡適を中心に渦いてゐる文學革命（下）》
《支那學》第1卷第3號，1920年11月。
前掲《支那文藝論叢》、《青木正児全集》第2卷所收。
- (4) 野原四郎《胡適と儒教》
《東洋的社會倫理の性格》所收，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編“東洋文化講座”第3卷，東京：白日書院，1948年11月。
後收入野原四郎《アジアの歴史と思想》，東京：弘文堂，1966年8月。
- (5) 竹内好《胡適とデューイ》
《デューイ研究——アメリカの考え方の批判》所收，東京：春秋社，1952年7月。
- (6) 井貫軍二《中國のルネッサンス——胡適を中心とする文學革命》
《教育時報》第1號，1952年12月。

- (7) 矢島鈞次《胡適博士の思想的立場》
《読書春秋》第4卷2號，1953年2月。
- (8) 大塚繁樹《胡適の新詩論》
《愛媛大學紀要》(第1部・人文科學)第2卷1號，1954年12月。
- (9) 大塚繁樹《胡適の詞論に於ける問題点》
《愛媛大學紀要》(第1部・人文科學)第2卷2號，1955年12月。
- (10) 藤吉慈海《禪仏教の問題——胡適と鈴木大拙との対論をめぐって》
《佛教文化研究》第6・7號，1958年3月。
- (11) 竹田復《胡適》
東京大學文學部中國哲學研究室編《中國の思想家——宇野哲人博士米寿記念論集》下卷，東京：勁草書房，1963年7月。
- (12) 柳田聖山《胡適之博士の手紙》
《禪學研究》第53號，1963年7月。
- (13) 横山永三《初期の新詩——胡適と朱自清》
《山口大學文學會志》第15卷1號，1964年10月。

[翻译・注释]

A. 胡适著述日译本

A-I. 著作・合集日译本

- (1) 橋川時雄譯，胡適著《輓近の支那文學》
東京：東華社，“現代支那學術叢書”第2編，1923年2月。
- (2) 楊祥蔭、内田繁隆譯，胡適著《古代支那思想の新研究》
東京：巖松堂，1925年9月。1939年4月再版。
東京：大空社，“アジア學叢書”第39卷，1998年2月。
- (3) 井出季和太譯，胡適著《胡適の支那哲學論》⁹
東京：大阪屋號書店，1927年。
“アジア學叢書”第40卷，東京：大空社，1998年2月再版。
- (4) 今関天彭譯，胡適著《支那禪學之變遷》
東京：東方學藝書院，1936年9月。
- (5) 吉川幸次郎譯，胡適著《四十自述》
大阪：創元社，“創元支那叢書”第1卷，1940年3月。
後改題《胡適自伝》，收入“養德叢書 外國篇”第1008冊，丹波市町：養德社，1946年12月。又，收入《吉川幸次郎全集》第16卷，東京：筑摩書房，1970年7月。1974年再版。

A-II. 论文・作品日译本

- (1) 青木正児譯，胡適著《私の子供》
《支那學》第1卷第10號所收《新詩二篇》之一，1921年6月。
前掲《支那文藝論叢》所收《胡適を中心に渦いてゐる文學革命》附録《譯新詩二篇》之一。前掲《青木正児全集》第2卷所收。
- (2) 柳田泉譯，胡適著《建設的文學革命論》
《世界大思想全集》第39卷所收，東京：春秋社，1929年7月。
- (3) 胡適著《日本國民に訴ふ》
《日本評論》第10卷11號，1935年11月。

⁹编者注——卷末附录《墨子小取篇新話》。

- (4) 吉村永吉譯，胡適著《文學改良芻議》
《文藝論集》，東京：東成社，“現代支那文學全集”，1940年。
- (5) 吉村永吉譯，胡適著《建設的文學革命論》
前掲《文藝論集》所收。
- (6) 吉村永吉譯，胡適著《短篇小説を論ず》
前掲《文藝論集》所收。
- (7) 福井康順譯，胡適述《支那史上に於ける宗教と哲學》
石田幹之助編譯，陳衡哲編《支那文化論叢》所收，東京：生活社，1940年4月。
1942年再版。
- (8) 原三七譯，胡適述《文藝の再生》
前掲石田幹之助編譯，陳衡哲編《支那文化論叢》所收。
- (9) 信濃憂人譯，胡適著《支那と日本の西洋化》
信濃憂人譯編《支那人の見た日本人》，東京：青年書房，1941年。
- (10) 沖野亦男譯，胡適著《中國思想》
H. F. マックネアー (MacNair, Harley Farnsworth) 編《中國》上卷第3部第13章，
大阪：三明社，“聯合國叢書”，1950年。東京：中國刊行會，1954年再版。
- (11) 胡適、胡思社著《共產主義論争——父と子》
《毎日情報》第6卷2號，1951年2月。(譯者不詳)
- (12) 胡適著《独裁政治批判》
《改造》第32卷5號，1951年4月。(譯者不詳)
- (13) 上原專祿、胡適述《生きているアジア文明》
《改造》第34卷3號，1953年3月。
- (14) 増田渉、服部昌之譯，胡適著《文學改良芻議》
増田渉編《五・四文學革命集》所收，“中國現代文學選集”第3卷，東京：平凡社，1963年3月。増田渉編《五・四文學革命集》所收，“中國の革命と文學”第2卷，東京：平凡社，1972年3月。

B. 胡适研究论著日译本

- (1) 艾思奇著《胡適のプラグマティズム哲學の反革命性と反科學性》(譯者不詳)
《國民の科學》第3號，1955年5月。
- (2) 波多野太郎譯，何幹之著《五四以來胡適派は中國の古典文學をいかに歪曲したか
か
(上)》
《日本文學》第4卷6號，1955年6月。
- (3) 波多野太郎譯，何幹之著《五四以來胡適派は中國の古典文學をいかに歪曲したか
か
(中)》
《日本文學》第4卷7號，1955年7月。
- (4) 波多野太郎譯，何幹之著《五四以來胡適派は中國の古典文學をいかに歪曲したか
か
(下)》
《日本文學》第4卷9號，1955年9月。
- (5) 艾思奇、葛力《胡適批判》
芝寬譯編《プラグマティズム批判》所收，東京：大月書店，“大月新書”，1955年。

[隨筆・序跋]

- (1) 胡適著《『日本のユーモア』序》
董頭光著《日本のユーモア》，出版地不明，1955年。
- (2) 目加田誠《胡適の死》
《文藝春秋》1962年5月號，1962年4月。
後收入《目加田誠著作集》第8卷，東京：龍溪書舍，1986年9月。
- (3) 吉川幸次郎《胡適——「折り折りの人」補遺——（上）》
《季刊東亞》1968年1月號，1968年1月。
《吉川幸次郎全集》第16卷所收，東京：筑摩書房，1970年7月。1974年再版。
- (4) 吉川幸次郎《胡適——「折り折りの人」補遺——（中）》
《季刊東亞》1968年4月號，1968年4月。
前掲《吉川幸次郎全集》第16卷所收。
- (5) 吉川幸次郎《胡適——「折り折りの人」補遺——（下）》
《季刊東亞》1968年8月號，1968年8月。
前掲《吉川幸次郎全集》第16卷所收。
- (6) 吉川幸次郎《「四十自述」再版あとがき》
前掲《吉川幸次郎全集》第16卷所收。

[书评]

- (1) 青木正児《胡適氏の中國哲學史覗き見の事》
《册府》第5卷第3號，1920年8月。
《青木正児全集》第7卷所收，東京：春秋社，1970年4月。
- (2) 青木正児《胡適著「紅樓夢考證」を読む》
《支那學》第1卷第11號，1921年7月。
前掲《青木正児全集》第7卷所收。
- (3) 内藤虎次郎《胡適之の新著章實齋年譜を読む》
《研幾小録》所收，東京：弘文堂書房，1928年。
《内藤湖南全集》第7卷所收，東京：筑摩書房，1969年。
- (4) 島田久美子《尾坂徳司著「中國新文學運動史——政治と文學の交点・胡適から魯迅へ」》
《中國文學報》第8號，1958年4月。

附録：《日本胡适研究论著目录稿（1970～2008）》補遺

[編纂]

- (1) 柳田聖山編《胡適禪學案》
臺北：正中書局，1975年6月。
京都：中文出版社，1981年10月再版影印。

[博士論文]

- (1) 山口榮《胡適思想研究——人と思想・學問》
岡山大學，1997年3月。

- (2) 藤田一乘《胡適の中國文學改革の施策——留學期から二十年代を中心として》
 佛教大學，2007年3月。
- (3) 陳玲玲《20世紀中國におけるイプセン受容史上の魯迅と胡適》
 名古屋大學，2007年3月。

[论文]

- (1) 柳田聖山《胡適博士と中國初期禪宗史の研究》
 《問題と研究》第4巻5號，1975年2月。後收入前掲柳田聖山編《胡適禪學案》。
- (2) 長嶋孝行《胡適博士による滑臺の無遮大會の年度の決定について》
 《宗教研究》第56巻第4號，1983年。
- (3) 柳田聖山《鈴木大拙と胡適》
 《石川縣教育展望》第17號，1986年2月。
- (4) 樓宇烈《胡適禪宗史研究平議》
 《曹洞宗宗學研究所紀要》創刊號，1988年3月。
- (5) 宮西英人《胡適の實驗主義とその評價》
 《東洋文化學科年報》第12巻，1997年。
- (6) 藤井省三著，張季琳、大久保明男譯《戀愛中的胡適——美國女友艾迪絲・克利福
 德・韋蓮司與中國現代化理論的形成》
 《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8巻第1期，1998年3月。
- (7) 藤井省三《ニューヨーク・ダダに恋した胡適——中國人の留學体験と中國近代
 化論の形成》
 沼野充義編《多分野交流演習論文集——とどまる力と超えゆく流れ》，東京大學
 大學院人文社會系研究科スラヴ語スラヴ文學研究室，2000年。
- (8) 高橋みつる《白話詩における人力車夫》
 《愛知教育大學研究報告》(人文・社會科學)第50輯，2001年。
- (9) 大橋義武《胡適の文學史觀について——「中國文學史」の成立に関する一考察》
 《中國研究月報》第62巻9號，2008年9月。

[翻译]

- (1) 阿川修三譯、陳平原著《經學と諸子學の方法をめぐる章炳麟と胡適の論争につ
 て
 (上)》
 《文教大學文學部紀要》第8巻，1994年。
- (2) 阿川修三譯、陳平原著《經學と諸子學の方法をめぐる章炳麟と胡適の論争につ
 て
 (下)》
 《文教大學文學部紀要》第9巻，1995年。

[随笔・序跋]

- (1) 吉川幸次郎《胡適著・近藤春雄氏譯「中國文化革命」序》¹⁰
 《吉川幸次郎遺稿集》第2巻，東京：筑摩書房，1996年2月。
- (2) 李迺揚譯，入矢义高著《回憶胡適先生》

¹⁰編者注——近藤春雄日译本《中国文化革命》一书并未出版。

歐陽哲生選編《追憶胡適》所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10月。

[书评]

- (1) 丸山朋之《書評〈中國の思想的危機——陳独秀・胡適・魯迅〉》
《辛亥革命研究》第10號，1993年12月。

[年谱・传记]

- (1) 柳田聖山《胡適博士禪學年譜》
前揭柳田聖山編《胡適禪學案》卷首所收。

[目录・文献]

- (1) 李慶《胡適和諸橋轍次的筆談》
《學術集林》第10卷，1997年8月。
後收入李慶編《東瀛遺墨——近代中日文化交流稀見史料輯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5月。
- (2) 石立善《日本胡适研究论著目录稿（1970～2008）》
《胡适研究通讯》第3期，北京：胡适研究会，2008年8月。

附记：本论著目录系日本富士 XEROX 小林节太郎纪念基金资助项目《胡适与日本——以近代中日学术交涉史为中心》的研究成果之一。

简讯

中研院近史所胡适纪念馆主任变更启事

自2008年8月21日起，胡适纪念馆原主任黄克武先生荣升中研院近史所副所长，遗缺由潘光哲先生继任。潘光哲，1965年生于台北市，台湾大学历史学系博士。曾任台大历史系兼任讲师、中研院史语所约聘研究助理、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学社（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访问学者。现任中研院近史所副研究员，兼任胡适纪念馆主任。专业研究领域为近现代中国史与当代台湾史。著有《华盛顿在中国：制作「国父」》与《「天方夜谭」中研院：现代学术社群史话》两部专书以及〈胡适与罗尔纲〉、〈「重新估定一切价值」——「胡适研究」前景的一些反思〉等学术论文三十余篇。（郑凤凰）

敬告读者

《胡适研究通讯》一岁了！一年来，承蒙海内外胡适研究同人之大力襄助，不断赐稿给我们，使我们能如时刊行，这是我们深表感谢的。在新的一年里，我们将竭诚办好本刊。

由《胡适研究通讯》刊行的稿件，不乏优秀之作。今后，我们拟将这其中的好文章集为《胡适研究论丛》陆续出版。早前我们编辑的《胡适研究论丛》（第1辑）近期将与读者见面。因此，我们诚挚希望海内外胡适研究专家为《通讯》赐稿。

《胡适研究通讯》今后要拓宽题材的范围，凡写与胡适有关的人和事之文稿，只要写得好，本刊均给予发表。

编者

2008-11-20

《胡适研究通讯》征稿启事

为了推动胡适研究，保持和加强胡适研究会会员和关心胡适研究活动的朋友之间的联系，胡适研究会将于 2008 年开始，刊印《胡适研究通讯》。

《胡适研究通讯》的内容主要是：汇录海内外胡适研究的各种信息；刊登胡适研究短论、书评；刊登胡适的未刊文献；登载重要著作、文章的内容摘要；报道胡适研究会的工作等等。热诚欢迎胡适研究会会员和海内外热心胡学的朋友们踊跃赐稿。

《胡适研究通讯》每年编印四期，每期 3—5 万字，将于每季度的第二个月（即每年的 2、5、8、11 月）印行。

《胡适研究通讯》为仅供学会会员阅看的非卖品，系内部印刷物，不公开出版、发行。每期印制 200 份左右。

因我们财力有限，因而凡被《胡适研究通讯》采用的稿件，一律不付稿酬。但作者可将其文稿再投给其他报刊。

《胡适研究通讯》由胡适研究会会长耿云志先生负完全责任，由宋广波负责征稿、编辑、印制及邮寄等事宜。

《胡适研究通讯》是专门为有兴趣做胡适研究的朋友们创办的一个学术园地。我们相信这是大家所共同期盼的，能够得到大家的爱护和支持。

联系人宋广波通讯方式：

北京东城区王府井大街东厂胡同一号宋广波收（邮编 100006）；

电子信箱：hushi911217@126.com

胡适研究会 2007，11，24

本《通讯》承蒙中研院近史所胡适纪念馆以大陆出版胡适先生遗著之部分版税资助印行。